

晉唐時期海路交通中往來佛僧的群體考察

何方耀

廣東社會主義學院教學一部副教授、副主任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提要：西方僧伽東來傳教和中國僧眾西行求法乃晉唐時期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兩種形式，其所行路線不外海、陸兩途。

對於海路佛教僧人之研究，前輩時賢論述頗多，然作群體考察之專門文章，似未之見。故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之上，搜討舊籍，勾沈索隱，將晉唐五百年間往來於海路之中、外佛僧按年代先後分類列表，進行群體考察，就其整體變化情況、東來傳教僧眾與西行求法華僧之群體比較、海路來華西僧國屬構成之特點、西行求法僧之存亡去留情況、西行求法僧之籍貫、西行求法之域外僧人等六個方面進行考察，縱向探究其消長變化軌跡，橫向剖析其整體結構狀況，藉以考察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結語認為：

(一)西行求法乃東來傳教之結果，其中，中國佛門強烈的邊地意識形成壯大的西行弘法運動，有別於其他外來宗教在華傳播的結果；

(二)就陸路求法與海路求法比較觀之，隸籍濱海與海路求法無必然之聯繫；

(三)就時代之變化觀之，七、八世紀，南海道成爲僧人赴印之首選，爲海路求法活動最盛之時，這反映了唐代海上貿易繁榮，也暗示了佛教傳播活動與商貿活動有著內在的互動關係；

(四)從整體上看，海路傳教求法活動與陸路有所關聯，但其間並不存在明顯的消長關係，而是與整個佛教傳播活動的興衰有明顯的內在關係。

關鍵詞：佛僧 求法 傳教 文化交流 海路 群體

漢唐時期，中、西（域）文化交流之最引人注目者，當數佛教東傳，而此東傳過程則表現爲中、印間人員的雙向流動，即西僧之東來傳教和華僧之西行求法。

這兩股相向而動的人員交流從其運動軌跡來看，則為海、陸兩途，無論是渡流沙、跨雪嶺的陸上旅途，還是歷驚濤、泛重溟的海上航程，都是曠日持久、九死一生的艱險旅程，對弘法者來說，只要能安全抵達目的地，海路、陸路，其作用無異，故弘法者選擇陸路或海路，就其目的而言並無太大區別。

但具體到某一個或某一群求法傳教者，其路線的選擇卻反映了其對當時政治形勢和地理環境所作出的某種判斷；亦反映了這兩條聯結中、西方之傳統商路之興衰變化情況。從時間而論，海路傳教西僧之東來約始於三世紀，而華僧循海西行求法則始於四世紀，故本研究上起西晉之初，下迄唐貞元年間（七八五—八〇五），將三至八世紀來往於海路的佛教僧徒者作為一個群體加以研究，縱向考察其消長變化軌跡，橫向分析其整體結構狀況，藉以考察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晉唐時期海路交通中往來佛僧及其整體變化情況

佛教在華傳播，有賴東來西僧之傳法佈道和西行華僧之求法傳經，前輩學者如馮承鈞、梁任公、周叔迦等先生都曾對東來西行之中外佛僧事跡、行狀作過系統研究，其中，馮承鈞著有《歷代求法翻經錄》，梁任公列有《西行求法古德表》，為我們對求法活動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本文所討論之海路傳教求法活動，上起兩晉，下迄唐季，長達五百餘年；所涉及之赴印求法者和來華弘法僧多達數百人。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研究對象如此之多，要對之進行整體考察、群體分析，既不可能對每位研究對象之生平活動作詳細描述，又必須將其納入研究視野之內；既不能對所有時代之具體情況作專門分析，又必須反映不同時代求法傳教活動之變化消長情況。

因此，作者覺得最為合適的方式莫過於採取「表解」的形式。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用圖表的方式總覽眾多研究對象的大致活動情況，這樣既可將所有研究對象之活動情況納入視野，又能反映不同時代的變化情況和活動特徵。然後，再在圖表所提供的總體情況的基礎上作具體判斷和綜合分析，以對晉唐五百年間之求法弘教活動之不同方面進行群體考察。

故本文作者不避煩瑣，在前輩、時賢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搜討舊籍，勾沈索隱，將晉初唐季五百年間（東來梵僧上溯至三國），來往於南海道之中外弘法僧俗之主要行跡再加以疏理，列為表一如下，以作整體分析。

表一：晉唐時期海路交通中往來佛教僧俗行跡一覽表 [註 1]

(一) 西行求法僧

姓名 (漢名、梵名)	國屬 ／ 籍貫	求法(傳教)行跡	經典傳譯情況	年代	出處
于法蘭	高陽人 (今河北 保定市)	嘗慨大法雖興，經道多闕，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佔婆)。		366 年之前啟程西行。其人與支遁同時，遁曾為追立像讚，遁歿於 366 年，則法蘭啟程，在是年之前。	梁《高僧傳》(中華書局，湯用彤點校本)卷四本傳，頁 166。
于道邃	敦煌人	十六歲出家，事蘭公(于法蘭)為弟子。後隨蘭公往天竺求法，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		336 年之前。	梁《高僧傳》卷四，頁 169-179。
法顯 梵名： Vinayadeva	平陽武陽人(今山西臨汾襄垣縣)	始發長安，同行者有慧景、道整、慧應、慧達、慧崑 5 人。至張掖後遇僧紹、智嚴、寶雲、慧簡、僧景 5 人，相約同行。同伴或中途折回、或分道而行，或死途中，或留印不歸，唯顯一人從師子國啟程，由海道歸國，至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登陸。顯由陸路經西域赴印，由西域南道經敦煌、鄯善、焉耆、于闐、子合(今葉爾羌南)、竭叉(今塔什庫爾幹)，度蔥嶺經中亞諸國南下經犍陀羅(今幹達馬克)、佛樓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等地至印度，遍遊五印，南至師子國。由此乘商舶經南洋諸國，本擬由廣州登岸，被暴風漂至長廣郡。	在中天竺得《摩訶僧祇律》、《薩婆多律》、《雜阿毘曇心論》、《方等泥洹經》，在師子國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等皆漢土所無，顯皆書寫賁回。歸國後與梵僧佛馱跋陀羅合作，譯出《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祇律》、《雜藏》諸經論百萬餘言。著有《佛國記》(亦名《法顯傳》)，今存。	399-412 年	梁《高僧傳》卷三，頁 87-90；晉·法顯《佛國記》，《大正藏》冊 51(史傳部)，頁 857-866。

<p>智嚴</p>	<p>西涼州（今甘肅武威）人</p>	<p>共法顯等沿陸路西行求法，行抵烏夷（今焉耆），為求行資，遂返高昌。後獨行至罽賓（今克什米爾），留彼地十年，從佛馱先（Buddhasena）咨受禪法，敦請佛跋陀羅（Buddhabhadra）東歸，參其譯事，始終相隨。晚年共弟子智羽、智遠泛海重到天竺。至罽賓無疾而化。世壽 78 歲。</p>	<p>嚴前於西域取得梵本眾經，未及翻譯，到元嘉四年（437）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經》、《廣博嚴淨》、《四天王經》等經典。</p>	<p>399 年先隨法顯由陸路經西域南道至罽賓，由陸路返華，後由海路經南海諸國重返印度。</p>	<p>梁《高僧傳》卷三，頁 98-100；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冊 49，頁 89C。</p>
<p>法勇，胡言曇無竭 Dharmodgaka</p>	<p>本姓李氏，幽州黃龍（今遼寧朝陽）人</p>	<p>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志，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等 25 人，遠適西方。度雪山時，經三日方過，料檢同侶，失 12 人。餘 13 人，經罽賓入中天竺，8 人復死於路，僅餘 5 人同行，後於南天竺隨商舶泛海達廣州。</p>	<p>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寫有傳記，今已佚，譯出賈回之《觀世音受記經》行於世。</p>	<p>420 年發足西行，歸期無考。</p>	<p>梁《高僧傳》卷三，頁 93-94；道宣《釋迦方志》（中華書局，范祥雍點校本），頁 98；《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蘇晉仁、蕭鍊子點校本）卷十五，頁 581-582。</p>
<p>道普</p>	<p>高昌（今新疆哈密）人</p>	<p>曾經陸路遊歷西域諸國，善能梵書，備諸國語。433 年曇無讖所譯之《大般涅槃經》傳至建康，道場寺僧慧觀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啟宋太祖資給，遣普將書吏十人航海西行赴印度求經，普與十人至長廣郡（今青島）候船，舶破傷足，普因疾而卒。</p>	<p>擬求《大涅槃經》後分，未果。</p>	<p>424-453 年</p>	<p>梁《高僧傳》卷二附《曇無讖傳》，頁 80-81。唐·道宣《釋迦方志》，頁 98。</p>
<p>智羽、智遠</p>	<p>不詳</p>	<p>智嚴弟子，嚴第二次赴天竺時與嚴一起泛海經南海諸國抵印，嚴卒，歸報，復返印。</p>		<p>427 年左右啟航西行，智嚴第二次赴印在是年之後。</p>	<p>梁《高僧傳》卷三，頁 98-100；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冊 49，頁 89C。</p>

<p>郝騫、謝文華等 80 人</p>	<p>不詳</p>	<p>南朝天監元年 (502)，梁武帝夢釋迦檀像入國，乃遣人往西竺求像。郝騫、謝文華等 80 人應詔西行，至舍衛國，從王請像，王令三十二匠為造紫檀人圖一相，騫等負相東還，泛海而歸，於天監十年 (511) 達於京師，梁武帝率百官，將釋迦檀像迎入太極殿，建蓮花塔安置，建齋度人，大赦斷殺。其後，梁元帝於荊州城北造大明寺，將檀像奉此安置。</p>		<p>502-511 年</p>	<p>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七《法運通塞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2 年，第 1491-1495 頁。</p>
<p>曇裕</p>	<p>琅琊 (此指東晉至隋僑置之南琅琊郡，初治金城，南齊時遷白下，位於今南京市北) 人</p>	<p>俗姓諸葛，為諸葛亮之後裔，少年出家，勇猛精進，為當時高僧志公和尚法嗣。天監十六年 (517)，為內道場沙門，出入宮禁，參與朝事。535 年，梁改元「大同」，七月，扶南國遣使來賀，梁使曇裕前往答謝並往南海諸國求取佛舍利，事畢泛海歸國，抵達廣州時，因「疲痾屢積」，難以返京復命，遂上表梁武帝，允留駐廣州並請留部分舍利供奉於寶莊嚴寺，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宏真福。於是，曇裕法師振奮精神，於寺內大殿前首築舍利塔 (即今之六榕寺花塔)，同時擴建殿宇，遂使寶莊嚴成為羊城一大名剎。某年九月二十六日，圓寂於寺，葬廣州城北柯子嶺和順崗，其墓塔猶存。</p>		<p>535 年 啟程往南海諸國求取佛舍利。</p>	<p>唐·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原碑已毀，錄文保存於寺內，《廣東通志·金石略》著錄；釋雲峰、余慶綿編，《廣州六榕寺志》(內部資料) 1999 年。</p>

寶雲	不詳	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奉敕往扶南國迎取佛髮。		538 年 啟程赴扶南。	《佛祖統紀》卷三十七，頁 1511。
曇閻	洛陽(今河南洛陽)人	由交趾啟航，附船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在今加里曼丹島) ^[註 2] 北渤盆國，遇疾而終，年三十矣。		664-665 年 《運期傳》稱「與曇閻同遊」，運期與會寧同時於麟德中(664-665)西行，則曇閻之西行亦應同時。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97。
運期	交州人	與曇閻同遊，仗智賢受具。旋回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國，於今現在。既而往復宏波，傳經帝里，佈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四十矣。	送會寧、智賢所譯之《大涅槃經後分》至京師。	664-665 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1。
會寧	益州成都人	以麟德中杖錫南海，泛舶至訶陵。停住三年，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Jñānabhadra)，華言智賢，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約六十餘卷。會寧既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表資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奉上闕庭。運期由京城還達交趾，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匹，重詣訶陵，報德智賢，與會寧相見，於是會寧方適西國，後不知所終。	從《阿笈摩經》內所譯出之如來焚身之部分，被視為《大般涅槃經後分》。然義淨認為「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664-665 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76-77。
窺沖法師，梵名質咀囉提婆：Citradeva	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內附近)人，	為明遠室灑，與明遠同舶而泛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性聰睿，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提樹，到王舍城。遭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666-667 年之前。窺沖在印曾與玄照相見，而照第二次赴印在 666-667 年間，可推知其赴印在此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4。

<p>義淨 梵名： Paramartha- deva，勝義 天</p>	<p>祖籍范陽 (今河北 涿縣)，生 於齊州(今 山東濟南)</p>	<p>義淨(635-713)俗名張文明，自幼出家，十五歲便有西遊之志，年三十七乃獲成行。初發足至番禺(今廣州)，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退罷，唯淨與小僧善行奮勵孤行，經室利佛逝等南海諸國於咸亨四年(673)二月抵達東印度耽摩底國。其後周遊五印，遍禮聖跡，於那爛陀寺學習十年。武后垂拱元年(685)離開那爛陀寺，仍取海道東歸，又於南海室利佛逝停留將近十年，期間，曾於689年返回廣州求助手及紙墨，於是年11月偕貞固等四人重返佛逝。後於長壽二年(693)年乘商舶返抵廣州，駐錫廣州一年多，於證聖元年(695)五月北上抵達京城洛陽。^[註3]此後於洛陽、長安兩地翻譯經典，直到圓寂。</p>	<p>據宋僧傳，義淨求得梵本經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前後翻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其所求之經，以律部為主，雖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儀軌》等五部；而據當代學者的研究，淨所譯經典尚有：《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七部五十卷；其著作尚有：《南海錄》、《西方記》、《西方十德傳》和《中方錄》等四部，今並佚。^[註4]</p>	<p>671-695 年</p>	<p>《宋高僧傳》卷一，頁1-4；《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冊55，頁568BC-569A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大正藏》冊55，頁869-872。</p>
<p>義朗</p>	<p>益州成都 (今四川 成都)人</p>	<p>與同州僧智岸及弟義玄共至烏雷(今廣西欽州縣)，同附商舶，越舸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經郎迦戌(今馬來西亞吉打，Kedha)，國王待之以上賓之禮，智岸於此病逝，朗公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後不知所終。</p>		<p>671 年 左右啟程。義淨在其傳中稱「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不復聞。」可知其約與義淨同時赴印。</p>	<p>《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72-73。</p>
<p>智岸</p>	<p>成都人</p>	<p>與義朗同行，至郎迦戌國，患病而逝。</p>		<p>671 年 左右啟程。</p>	<p>同上</p>
<p>義玄</p>	<p>成都人</p>	<p>義朗之弟，與朗偕行。</p>		<p>671 年 左右啟程。</p>	<p>同上</p>

大乘燈，梵名莫訶夜那鉢地已波： Mahāyāna-pradīpa	愛州人	幼隨父母往杜和羅鉢底國（今泰國湄南河下游一帶之古都大城府，梵名 Dvārapatī），方始出家。後隨唐郊緒入京，受業於玄奘法師。矢志西行求法，乃由海道經師子國入南印度，旋至東印度耽摩立底國，在此與義淨相遇，共詣中天竺，留學那爛陀，後遷化於中天竺俱尸城般涅槃寺，時年約六十。		671 年之前。義淨約於 671 年抵達耽摩立底國，燈在此與淨相遇，則其西行應在是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88-89。
善行	晉州（今山西臨汾一帶）人	義淨弟子，隨義淨泛海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沈痼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671 年啟程。	《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167。
僧哲	澧州（今湖南澧縣）人	思慕聖蹤，泛舶由海道抵印，既至西土，巡禮略周，歸東印度三摩怛吒國，住此國王寺，義淨在印時曾聞知其消息。		671 年之後不久。《玄達傳》云：「僧哲至印度，云其人已亡。」達與淨同於 671 年抵廣州，則哲應在此後不久啟程西行。	《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169。
玄遊	高麗國人	僧哲弟子，隨僧哲泛海西遊，並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671 年之後不久啟程。	同上，頁 174。
靈運 梵名般若提婆： Prajñādeva, 意慧天	襄陽（今湖北襄樊市）	與僧哲同由海路抵印，極嫻梵語，所在之處，君王敬禮，遂於那爛陀寺畫慈氏（彌勒）真容、菩提樹像，實以歸國，廣興佛事。		671 年之後不久。	同上，頁 168。
智弘	洛陽人	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與無行禪師同契，至合浦升舶，長泛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復向交州，住經一夏。即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至室利佛逝國，後		671-695 年間啟程西行。	同上，頁 174-175。

		泛海至印度，到大覺寺，住經二載，閑聲論，能梵書。於那爛陀寺側披覽大乘，在信者道場，乃專攻小教。習德光（Gunaṇprabha）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功夫。後向北天羯濕彌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道琳）為伴，後不知所終。			
無行 梵名般若提婆： Prajñādeva	荊州江陵人	與智弘法師一同泛海西行，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四事供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州（在今印尼蘇門達臘島），又泛海經羯荼國、那伽鉢亶那國（古代南印度港口，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納加帕蒂南）抵師子國。後又從師子國泛海至訶利雞羅國，停住一年，與智弘同行，漸之東印度。入大覺寺，得為主人（即寺內常住），不久至那爛陀寺，習《瑜伽》、《中觀》、《俱舍》。復往抵羅茶寺習因明。義淨在印度時常與之往還，後與義淨於那爛陀分手，擬北向由陸路歸國，卒於北印度。	在印度時曾從《阿笈摩經》譯出如來涅槃之事部分，略為三卷，與會寧與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於室利佛逝共譯《大涅槃經後分》之內容相同。無行卒後，其所譯及所求梵本由同行求法僧帶回國內，敕由西京華嚴寺收掌，善無畏與沙門一行於彼梵簡內，尋出數本密教總持經典，加以翻譯。可知其所求梵本多密教典籍。其譯本與其所著之遊記《中天竺附書》今並失傳。	671-695 年間啟程西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182-283；宋·贊寧《高僧傳》（以下簡稱《宋高僧傳》）卷二〈善無畏傳〉（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20；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大正藏》冊 55，頁 572A；智昇，《續古今譯經圖記》「戍婆揭羅僧訶（即善無畏）」條。
玄達	潤州江寧（今南京市）人	有志西行求法，於丹陽（今南京）與義淨相見，同契南下，於咸亨二年（672）抵達廣州，擬附舶西行，因染風疾，弗遂遠懷，於是悵然而歸，返錫吳楚，不久患病身亡。		672 年抵廣州準備泛海西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145-146。

天津	澧州（今湖南澧縣）人也	以唐永淳二年（683）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人。乃賫經像，與唐使相逐，泛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後義淨歸自印度，亦住於此，以天竺之中，諸方皆悉有寺，神州獨無，遂請天津歸唐，請帝於西方造寺，遂以 691 年 5 月 15 日附舶而向長安，併賫義淨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至京師奉上。		683-691 年	同上，頁 207-208。
法振	荊州人	與乘悟、乘如一起泛海赴印，至南海羯荼國患疾而亡。		685 年之前啟程。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206。
乘悟	荊州人	與法振、乘如一起泛舶西行，至羯荼國法振病卒，遂與乘如返舶東歸，至瞻波（林邑）病卒。		685 年之前啟程。	同上。
乘如	梁州（今陝西固城）	與法振、乘悟同遊，至羯荼法振病卒而返，至林邑乘悟又亡，乘如獨自一人返回故里。		685 年之前啟程。	同上
道琳 梵名尸羅鉢頗： Śīlaprabha ，意戒光	荊州江陵人也	欲尋流府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學一切有部律，尤重陀羅尼咒法，遊歷印度各地，後向北印度擬從陸路歸國，為賊所擁，不遂所懷，自爾之後，不委所託。		685 年之前。義淨返回至南海羯荼國時仍聽到其消息，則其在淨 685 年離印之前已抵印度。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133。
明遠， 梵名振多提婆： Cintādeva ，意思天	益州清城（今四川灌縣）	由交阯啟航泛海西行，經訶陵至師子國，欲潛取佛牙，攜回本國供養，為國人所覺，頗被凌		686 年之前。義淨在印時曾聽到其消息，則其赴印應在義淨離印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67-68。

		辱。後北上至南印度，傳聞曾至大覺寺，後莫知所終。		國時間（686）之前。	
貞固 梵名娑羅笈多： Śālagupta	鄭地滎陽（今河南鄭州）人	十四出家，有志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聖跡，遂於垂拱年間（685-688）屆於番禺，駐錫清遠峽山寺。永昌元年（689）七月，義淨從室利佛逝乘商船抵廣州求購紙墨並邀請同道赴佛逝翻譯佛經。貞固與弟子懷業等四僧應邀隨淨於同年 11 月附商船返回佛逝，參與翻譯佛典，於長壽二年（693）隨義淨返回廣府，未經三載，遇疾而卒。		689-693 年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頁 211-216。
懷業 梵名僧伽提婆： Sanghadeva，意眾天。	祖籍北方，生於廣府	義淨至廣州時，即與其師貞固隨行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為義淨侍者，協助翻譯，時年十七。後義淨、貞固返回廣州時，留住佛逝，不返番禺。		689 年啟程。	同上，頁 238。
道宏 梵名佛陀提婆： Buddhadeva，意覺天。	汴州雍丘（今河南杞縣）人	其父早年經商，後出家為僧，道宏亦隨父出家，往來廣府，頗工草隸，二十二歲時隨義淨、貞固等共赴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復隨淨、固返回廣府。		689-693 年	同上，頁 239-240。
法朗 梵名達摩提婆： Dharmadeva，意法天	襄州襄陽人	童年出家，遊涉嶺南，淨至番禺，邀同道往佛逝，法朗與貞固等四人一起隨義淨赴佛逝，時年二十四歲。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抄寫經論，乞食自濟，後往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		689 年啟程。	同上，頁 242-244。

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	新羅國（今朝鮮半島）	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今印尼蘇門達臘島）西婆魯師國（今印尼蘇門達臘島西部），遇疾俱亡。		691 年之前啟程。凡義淨《求法高僧傳》所記之年代不詳者，均斷其為該書編撰完成時間之前，即 691 年之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45。
常愍及弟子一人	并州（今山西太原）人	欲經海路往天竺取經，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Malayu, 在今印尼蘇門達臘島西部），復從此國附商舶往中天竺，因船將破，眾人爭奪救生小舶，船主為信士，力邀常愍上小舶逃生，愍欲他人逃生得救，誓與大舶共存亡，遂合掌西方，口稱彌陀，船沈與弟子俱亡。		691 年之前啟程。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頁 51-52。
解脫天 梵名： Mokṣadeva	交州人	泛舶南溟，經遊諸國，至印度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歲。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83。
智行， 梵名般若提婆： Prajñādeva， 意惠天。	愛州（今越南清化一帶）	泛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歲。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87。
慧琰	交州人	為智行之室灑，隨師至僧訶羅國（即師子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86。
彼岸 智岸	高昌人	少長京師，傳燈是念，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策）相隨，泛海東歸，途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伽師地論》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95-96。
義輝	洛陽人	聽《攝大乘論》和《俱舍論》，見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異觀梵本，親聽微言，遂西行至中天竺，由海路歸國，至郎迦戌國（馬來西亞吉打），遇疾身亡。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99。

曇光	荊州江陵人	由海道赴印，至東印度訶利雞羅國，後不知所終。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141。
慧命	荊州江陵人	由海道赴印，泛舶行至占波（今越南中部），遭遇風暴，屢進艱難，廢然返國。		691 年之前。	同上，頁 143。
慧日	東萊（山東半島東部）人	唐中宗朝（684）度為沙彌，及登具足，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天竺，心恆羨慕。遂誓遊西天，乃泛舶南海，經崑崙、佛逝、師子等國，三年乃至印度。巡禮聖跡，尋求梵本，經一十三載，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經四載，歷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於開元七年（719）返抵長安。歸而專弘淨土之宗。	所求多為淨土經典，著有《往生淨土集》。	701-719 年	《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本傳，頁 722-723。
慧超	新羅人	何時入華已不可考，開元七年（719）密宗大師金剛智從海道抵廣州，慧超於此與其相會並成為其受業弟子。約於開元十一年（723）啟程沿海道往印度求法，經南海諸國抵東印度，先後巡視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諸國，最後經中亞各地，於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長安。回漢地之後，曾在長安大薦福寺繼續在金剛智門下受業，兼為其用手。金剛智去世後，又師從不空三藏研究經論，約卒於建中（780-783）年間。	有無取回經典或取回何類經典不可詳考，回漢地後曾在金剛智和不空的指導下研讀《大乘瑜珈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並於德宗建中元年（780）於五台山將此經錄出。	723-727 年	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中華書局，2000 年。
不空 梵名阿目佉跋折羅：	北印度人	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	不空自 742 年西行求法，凡得梵本瑜珈真言經論	742-746 年	《宋高僧傳》卷一，頁 6-12；趙遷撰，《廣智不

Amoghavajra		<p>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共譯。732 年，智歿於洛陽，空奉旨往五天竺並師子國，於 742 年冬至南海郡，附商舶，率弟子含光等二十七人奉國信經南海諸國抵師子國。師子國國王禮遇甚厚，空於普賢阿闍梨前受五部灌頂，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次遊五印度境。746 年還京。進師子國王奉唐皇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氈等。玄宗召入內，立灌頂道場。所賫梵經，盡許翻度。肅宗時（756-762）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代宗時繼續譯經，以 774 年卒，世壽七十。</p>	<p>五百餘部，返國後，起 746 年，迄 774 年，前後譯經 77 部，凡 120 餘卷，是為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四大家」之一，亦為密教「開元三大士」之一，所譯經典以密宗為主。</p>		<p>空三藏行狀》：《貞元新定釋教錄》卷十五，《大正藏》冊 55，頁 881-884；《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上，《大正藏》冊 55，頁 748-757。</p>
含光、慧辯	不詳	<p>742 年隨不空金剛附商舶往五天竺並師子國，屬彼國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並慧辯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747）年返回長安，不空譯經，常當參議華梵，後不知所終。</p>		742-746 年	<p>《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本傳，頁 678-679。</p>
由廣州往印度之二十餘名中國僧人	不詳	<p>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記載：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有寺名蜜栗伽悉他鉢娜寺（原註：唐云鹿園寺），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厥號支那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僧所造。（原註：支那即廣州；莫訶支那即</p>		不可確考	<p>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頁 103。</p>

		<p>京師。)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原註：蜀川去此寺有二百餘驛。)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供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鹿園寺矣。準支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令不絕也。義淨至印度時為七世紀下半期，若前推五百年，則為漢末，多數學者認為五百餘年乃虛指而非實指。明言此二十餘僧乃從廣州啟程，又謂其由牂牁道或滇緬道赴印，當時，南海道至印度之航路已通，若從廣州出發，似應取海路。</p>			
<p>悟空 梵名：達摩 馱都 Dharmadhātu</p>	<p>京兆雲陽 (今陝西咸陽市涇陽縣)人</p>	<p>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罽賓(Kapiśa)國遣首領薩婆達幹與三藏舍利越摩來朝，請使巡按。次年，敕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訪罽賓，時悟空尚未出家，亦奉旨隨使團西行。天寶十二年(753)至罽賓東部都城健陀羅國，使團返回時，悟空患病不能同行而留住罽賓。病癒後遂於肅宗至德二年(757)依舍利越摩出家為僧，號達摩馱都，華言法界，出家</p>	<p>其所取並翻譯之《十地》、《迴向輪》、《十力》等三經由圓照收入《續開元錄》中。</p>	<p>751-789 年。</p>	<p>《宋高僧傳》卷三本傳，頁 50-51；圓照《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紀》(十力經序)。</p>

	<p>後遂習梵典，遊歷天竺各地，前後十餘年。後因思念唐國而東歸。臨別，其師舍利越摩授梵本《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並佛牙舍利。歸途中，曾於龜茲勿提提屬魚三藏翻《十力經》；經北庭都護府時與戒法三藏譯《十地迴向輪經》。後隨中使段明秀於貞元五年（789）返抵長安，進上佛牙舍利和經本。空西行時二十餘歲，返回時已年過六十，為留印時間最長之求法僧，悟空之歸國標誌著漢唐西行求法活動之終結。〔註 5〕</p>			
--	------------------------------------------------------------------------------------------------------------------------------------------------------------------------------------------------------------	--	--	--

(二)東來傳教僧

姓名	國屬	傳法行跡	譯經情況	時間	出處
康僧會	康居人	<p>其先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十餘歲出家。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以吳赤烏十年（248）初達建業。時江左雖有支謙等譯經傳法，然佛教未行，會至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孫權詔會詰問佛教大意，會以瑞應感化，遂為建塔，始有佛寺，號為建初寺，會於其寺譯出眾經，280 年遭疾而終。</p>	<p>會先後於建初寺譯出《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經》等經及《小品般若》、《六度集經》、《雜譬喻經》等經典，皆妙得經體，文義允正。</p>	<p>248-280 年入吳都建康傳法。</p>	<p>梁《高僧傳》卷一，頁 14-19；《出三藏記集》卷十三，頁 512-515；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三，《大正藏》冊 55，頁 787C-788。</p>
支疆梁接 Kalasivi, 華言正無畏	月氏人	<p>於三國孫亮五鳳二年（255）泛海至交州（時州治在番禺，即今廣州市，217 年起交州州治遷番禺直到 264 復置交、廣二州）傳法譯經。</p>	<p>譯出《法華三昧經》</p>	<p>255 年抵達交州。</p>	<p>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五，《大正藏》，冊 49，頁 56C；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藏》冊 55，頁 491C。</p>

<p>疆梁婁至 Kālaruci， 晉言真喜</p>	<p>西域人</p>	<p>志情曠放，弘化在懷，以武帝太康二年辛丑（281），泛海至廣州。</p>	<p>在廣州譯出《十二遊經》</p>	<p>281 年抵廣州。</p>	<p>《歷代三寶紀》卷六，《大正藏》冊 49，頁 65A；《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藏》冊 55，頁 497B。</p>
<p>耆域 Jivaka</p>	<p>天竺人</p>	<p>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行跡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於扶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今湖北襄樊），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以晉惠（290-306）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嘗以咒法、淨水與人治病，病者應手而癒。後洛陽兵亂，經長安、渡流沙，辭還天竺，後不知所終。 [註 6]</p>	<p>為神異之僧，以咒術異行化人，不事譯經。</p>	<p>290-306 年間入華。</p>	<p>梁《高僧傳》卷九本傳，頁 365-366；明·朱棣撰《神僧傳》卷一，頁 18-19（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 年）；《六學僧傳》卷二十九。</p>
<p>支法防</p>	<p>西域人</p>	<p>西晉哀帝時（362-365）泛海至廣州，同以《後漢紀》傳世的著名文士兼南海太守袁宏共登羅浮山，憑弔單道開修道之石室，見其形骸俱在，瓦器尚存。</p>		<p>362-365 年間入華。</p>	<p>梁《高僧傳》卷九〈單道開傳〉，頁 360-362；《羅浮山志彙編》。</p>
<p>曇摩耶舍 Dharmayaśas 華言法明</p>	<p>罽賓（今克什米爾）人</p>	<p>少而好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該覽經律。遊方授道，以晉隆安中（397-401）泛海至廣州，住白沙寺，有徒 85 人，耶舍善誦毘婆沙律，人號其為大毘婆沙。至義熙中（405-418）北上長安，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亦至關中，因共譯出《舍利弗阿毘曇</p>	<p>於廣州白沙寺譯出《差摩經》一卷；在長安時共曇摩掘多譯出《舍利弗阿毘曇》二十二卷。</p>	<p>397-401 年附商舶抵達廣州。</p>	<p>梁《高僧傳》卷一本傳，頁 41-43；《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藏》冊 49，頁 77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六，《大正藏》冊 55，頁 814AB。</p>

		》，以 407 年初書梵文，至 414 年翻譯方竟。耶舍後遊江陵，大弘禪法，至宋元嘉中（424-453）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度	天竺人	曇摩耶舍弟子，父竺婆勒為南海商人，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生度於南康（今江西贛州）。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駐廣州，弘傳小乘戒法，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非但廣州尼眾遵其法式，京城尼眾亦習其遺風。法度此舉，遭到大乘僧眾的非難。法度雖為入華之印僑，然其父為南海道商人，法度師承耶舍弘傳小乘戒法，亦可視為東來弘法梵僧之一。	但傳小乘戒法而無譯經。	397-465 年傳法於廣州一帶。	梁《高僧傳》卷一〈曇摩耶舍傳〉，頁 42-43；《出三藏記集》卷五〈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頁 232-233。
佛陀跋陀羅 Buddha- bhadra， 華言覺賢	印度迦維羅衛國人	本釋迦之苗裔，少年出家，以禪律馳名，會秦沙門智嚴西至闕賓，聞名要請，於是捨眾辭師，步驟三載，既度蔥嶺，路經六國，達於交趾乃附舶循海，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後因流言被擯，南詣廬山，為慧遠迎入，傳譯經典。後至建康，止道場寺，共沙門法業、慧嚴、法顯等傳譯經典，以元嘉六年（429）卒，春秋七十有一。	於道場寺共沙門百餘人譯出支法領賈回之《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及《觀佛三昧經》、《修行方便論》等經論；又與法顯等譯出《僧祇律》，前後譯經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	401-413 年間入華。	《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頁 541-543；梁《高僧傳》卷二本傳，頁 69-73。

<p>竺難提 Nandi, 晉言 喜法。</p>	<p>印度居士</p>	<p>東晉時由海路入華，首抵廣州，並於廣州、建業等地譯經傳法。</p>	<p>晉宋間於廣州譯出《威革長者六向拜經》一卷。另譯有《請觀世音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一卷和《大乘方便經》二卷。</p>	<p>419 年入華，譯經於廣州、建業等地。</p>	<p>《歷代三寶紀》卷七，《大正藏》冊 49，頁 72A。</p>
<p>杯度</p>	<p>不詳</p>	<p>杯度，不知名諱，因其常乘木杯度水，故以為號。初現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行化於京洛、江淮一帶，或乘杯渡水，或符咒治病，或分身無數，神異莫測。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度辭別眾檀越、弟子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遂絕跡於北方。嶺南則傳說他以一木杯泛海至南海（廣州），憩屯門山（今深圳寶安之青山），謂其弘化於寶安一帶，法徒頗眾，今屯門山中有杯度岩，岩中有其畫像。或許，杯度泛海而來，先傳法於北方，後行化於嶺南，後不知所終。</p>		<p>420-479 年間入華。</p>	<p>梁《高僧傳》卷十本傳，頁 378-384；《神僧傳》卷三，頁 103-111；《六學僧傳》卷二十九。</p>
<p>求那跋摩 Guṇavarman</p>	<p>罽賓人</p>	<p>本罽賓王種，以 367 年生，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後至師子國，觀風弘教，又至闍婆（今印尼爪哇島），國王敬禮，道化遠播，鄰國風聞，皆遣使要請，宋京師沙門慧觀、慧聰等於 424 年啟請宋文帝迎請之，帝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等往彼祈</p>	<p>先後譯出《菩薩善戒經》（或稱《菩薩戒地》）三十卷、《雜心》十三卷、《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p>	<p>424 年左右至廣州。</p>	<p>梁《高僧傳》卷三本傳，頁 105-114；《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頁 543-544；《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冊 49，頁 90BC-91A。《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大正藏》冊 55，頁 606A。</p>

		請，並致書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適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船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後由廣州赴京，以 431 年達於建康，住祇洹寺。傳譯經典，傳授戒法，後卒於祇洹寺，春秋六十有五。			
鐵薩羅等十九名師子國尼師	師子國人	元嘉六年（429），南海商船舶主竺難提運送師子國八名尼師至宋都建康，準備為影福寺慧果、慧淨等 300 名中國尼眾二部受戒。此前，中國未有尼眾戒師，故中國尼眾未能二部受戒，然按尼眾戒制，尼師至少十名以上，方能如律受戒，來華師子國尼師僅有八名，故不能如律為中國尼眾受戒。後船主竺難提於元嘉十年（433）又送鐵薩羅等 11 名比丘尼至建康。先達諸尼，已通宋語。遂請僧伽跋摩為傳戒師，於南林寺壇界，次第三百餘中國比丘尼重授具足戒，中國尼眾二部受戒實至此始。據傳，當時為紀念此事在建康建一尼寺，命名為鐵薩羅寺。此 19 名師子國比丘尼入華亦是史籍中所見西方尼眾來華傳法之唯一記載。		429-433 年間分二批抵達建康。	梁《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頁 105-114；梁寶唱《比丘尼傳·僧果傳》；《比丘尼傳》卷三〈僧敬傳〉；《出三藏記集》卷十四〈僧伽跋摩傳〉；《南朝佛寺志》卷上。
僧伽跋摩 梵名 Samghavarman， 華言眾鏡	天竺人	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明解三藏，尤精律藏。以宋元嘉十年（433）由陸路經西域達建業。風宇宏肅，道俗敬異，號曰三藏法師	先後譯出《雜心》、《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四部經論。	433 年以陸路入華，438 年左右由海道返回本國。	《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頁 544-545；梁《高僧傳》卷三，頁 118-119。

		<p>。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平陸寺，僧眾歸集。跋摩深明戒品，值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 19 尼至建業，眾乃共請跋摩為師，為影福寺尼慧果等尼眾受具戒。頃之，慧觀等以三藏妙解《雜心》，諷誦通達，更請出焉。寶雲譯語，慧觀筆受，周年方迄。續出《摩得勒伽》等經。跋摩以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畢，將還本國，眾咸祈止，莫之能留。以元嘉（424-453）中（438）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p>			
<p>求那跋陀羅 Gṇabhadrā 華言功德賢</p>	<p>中印度人</p>	<p>本婆羅門種，博通三乘，兼學大小乘，遊方弘化，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泛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並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經咒，懇至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於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建康，眾僧共請出經，先後於祇洹寺、東安寺、丹陽郡、荊州辛寺傳譯經典，468 年卒於建康，春秋七十有五。</p>	<p>先後譯出《雜阿含經》、《法鼓經》、《勝鬘經》、《楞伽經》、《無憂王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無量壽經》、《泥洹經》、《央掘摩羅經》、《相續解脫波羅密了義經》、《現在佛名經》、《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經》等經論，前後譯凡百餘卷。</p>	<p>435 年 抵達廣州。</p>	<p>梁《高僧傳》卷三本傳，頁 130-134；《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頁 547-550；《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冊 49，頁 92AB。</p>
<p>竺法眷</p>	<p>天竺人</p>	<p>南朝宋明帝時（465-472）泛海至廣州譯經傳法，未至都城建康。</p>	<p>先後於廣州譯出《海意經》、《如來恩智不思議經》、《寶頂經》、《無盡</p>	<p>465-472 年 間抵達廣州。</p>	<p>《出三藏記集》卷二，頁 62、頁 77；《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冊 49</p>

			意經》、《三密底耶經》、《阿述達菩薩經》六部合二十九卷。		，頁 93C。《開元釋教錄》卷五， <i>《大正藏》</i> 冊 55，頁 532B； <i>《貞元新定釋教目錄》</i> 卷八， <i>《大正藏》</i> 冊 55，頁 829A。
僧伽跋彌	師子國人	《開元錄》載其來華傳譯經典，未載其入華之途，因是師子國人，應從海路來華，因師子國入華傳法僧未見有陸路入華者，故僧伽跋彌亦應由海路經南海道泛海來華。	譯出《彌沙塞律抄》一部。	478 年前譯經建業。	《開元釋教錄》卷五， <i>《大正藏》</i> 冊 55，頁 532C。
求那毘地 Guṇavarḍdhi ， 華言安進	中印度人	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諳究大小乘，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南朝齊建元（479-482）初，由海路來華抵達京師，止毘耶離寺，譯經傳法，道聲遠播，王公貴勝，迭相供請。永明以後（493）譯經迨絕。毘地為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以 502 年終於建康正觀寺。	先後譯出《百喻經》十卷，《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	479-482 年間抵達建康。	梁《高僧傳》卷三本傳，頁 138-139； <i>《出三藏記集》</i> 卷十四，頁 552； <i>《貞元新定釋教目錄》</i> 卷八， <i>《大正藏》</i> 冊 55，頁 834B。
曇摩伽陀邪舍， Dharmajātayāśas，華言 法生稱	中印度人	悟物居情，導利無捨，以齊高帝道成建元三年辛酉（481）泛海至廣州，住朝亭寺，譯《無量義經》一部，邪舍手善隸書，口解齊言，傳受經人。武當山沙門慧表於永明三年（485）賣至揚都，繕寫流布。	譯《無量義經》一部。	481 年至廣州。	《出三藏記集》卷二，頁 63；卷九（無量義經序）；頁 352-353； <i>《歷代三寶紀》</i> 卷十一， <i>《大正藏》</i> 冊 49，頁 95B； <i>《開元釋教錄》</i> 卷六， <i>《大正藏》</i> 冊 55，頁 535BC； <i>《貞元新定釋教目錄》</i> 卷八， <i>《大正藏》</i> 冊 55，頁 833B。
僧伽婆羅 Saṅghapāla 華言僧養	扶南國（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一帶）	學年出家，偏業阿毘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以後，廣習律藏，	先後譯出《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經論十一部四十八卷。	483-493 年間入華。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本傳，金陵刻經處，清光緒十六年（

	人	<p>勇意觀方，聞齊國（南朝齊）宏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羅弟子。復從跋陀精研方等，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亡，道教凌夷，婆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梁興，搜訪術人，以 506 年被敕徵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疑為占婆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經典，翻經之日，齊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於 524 年病卒，世壽六十五。</p>			<p>1890) 刻本；《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冊 55，頁 537C；《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835C。</p>
摩訶乘 Mahāyāna	外國沙門	<p>南朝齊武帝時泛海至廣州，譯經傳法，其生平事跡不可詳考。</p>	<p>南朝齊武帝永明年中(483-493)於廣州譯出《五百本生經》一卷，《他毘利律》一卷。</p>	<p>483-493 年間抵達廣州。</p>	<p>《出三藏記集》卷二，頁 63；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大正藏》冊 49，頁 95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八，《大正藏》冊 55，頁 833C。</p>
僧伽跋陀羅 Saṃgha- bhadra 佚名之三藏 法師	西域人	<p>佛涅槃後，弟子優波離 (Upāli) 集結律迄，於其年 7 月 15 日受自恣 (pravāraṇā) 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並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離入滅後付弟子陀寫俱，陀寫俱欲涅槃付弟子須俱。須俱欲涅槃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欲涅槃付弟子目健連子帝須。目健連子帝須欲涅槃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南朝齊時，傳至一佚名之三藏法師，三藏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p>	<p>譯出《善見律毘婆沙》，此律為小乘律部「五論」之一，乃中國僧眾依「眾聖點記」確定佛祖釋迦牟尼入滅年代所依據之佛典，依此可倒推佛祖涅槃於西元前 486 年。</p>	<p>488 年左右抵達廣州。</p>	<p>《出三藏記集》卷二，頁 63、卷十一，頁 419；《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大正藏》冊 49，頁 95BC；《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冊 55，頁 535BC；《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八，《大正藏》冊 55，頁 833C-834A；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七。</p>

		，船反還去，以律藏付其弟子僧伽跋陀羅。僧伽跋陀羅於南朝齊永明六年（488）在廣州竹林寺共沙門僧猗譯出此經。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489）庚午歲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華供養律藏訖即下一點。當其年計得九百七十五點。			
智藥三藏	天竺國人	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自其本國持菩提樹航海東來，植於廣州王園寺（今廣州光孝寺）戒壇前，志曰：吾過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後沿北江北上，至韶州（今廣東韶關曲江縣）曹溪水口，聞水香，掬而嘗之，曰：此溯上流別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今韶關曲江南華寺），乃預記曰：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嘗開月華寺；住羅浮，創寶積寺；後來韶，又開檀特寺、靈鷲寺。神異莫測，後不知所終。		502 年至廣州。	明刻〈光孝寺重修六祖菩提碑記〉，（見《廣州市文物志》第 4 編「光孝寺石刻」，第 222 頁）；清·顧光《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中華書局 2000 年線裝版），頁 60。
曼陀羅(仙) Mandra 華言宏弱	扶南國人	神解超悟，幽明畢觀，無憚夷險，志在開化，以梁武帝天監二年癸未（503）大賫梵本，遠來貢獻，屆於梁都，敕與僧伽婆羅共譯經三部。	先後譯出《寶雲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三部。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隱質。	503 年左右入華。	附見於《續高僧傳》卷一〈僧伽婆羅傳〉；《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冊 55，頁 537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835B。
菩提達磨 Bodhidharma	南天竺人	本婆羅門種，神慧疏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	常以四卷《楞伽經》授學者，謂是如來心地要	527 年抵達廣州。	《續高僧傳》卷十九本傳；《洛陽伽藍記》卷一

		<p>寂，通徹數，定學高之。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入寂，遂演化本國，念震旦大國，佛法興盛，遂往弘傳，乃辭祖塔，別學侶，泛重溟，凡三周寒暑，於梁普通八年（527）九月達於廣州，刺使蕭昂同迎，奏聞梁武帝。帝遣使賈詒請至金陵（南京），與之應對不契，遂渡江北上魏境，屆於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弘傳禪宗心法，為時人所重，被後世視為禪宗東土初祖，後傳法並衣鉢與二祖惠可，云：內傳心法，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自言已一百五十餘歲，後數被人毒害，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p>	<p>門，而不事傳譯。</p>		<p>永寧寺條、修梵寺條；《祖堂集》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60-72；《景德傳燈錄》卷三（成都古籍書店，2000年），頁 29-37；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七，頁 1503-1549；清·顧光《光孝寺志》卷六《法系志》。</p>
<p>波羅末陀 Paramārtha，華真諦，或云拘那羅陀 Kulanātha，華言親依</p>	<p>西印度優禪尼國（Ujjayani，今印度中央邦之 Ujjainī）人^[註 7]</p>	<p>以 499 年出生，群藏廣部，無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大同（535-546）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彼國乃屈真諦，並賈經論，以大同十二年（546）八月達於南海（今廣州），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 548 年 8 月始屆京師，諦欲翻經教，以侯景之亂，不果宣述，乃步</p>	<p>真諦在華 23 年，雖大半時間皆處動蕩流離之中，然譯經不輟，先後出經論記傳 64 部，278 卷（此據《續高僧傳》，《開元錄》謂 49 部 142 卷），主要有《解節經》、《金光明經》、《攝大乘論》、《俱舍論》、《唯識論》、《金剛經》等經論。真諦所賈梵本經論甚多，所譯僅為少數，餘有未譯梵本並多羅樹</p>	<p>535 至 546 年間入華。</p>	<p>《續高僧傳》卷一本傳；《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546ABC-547A；《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卷十，《大正藏》冊 55，頁 836BC-837AB 和 844BC-845A。</p>

		入江東，避難各地，先後輾轉富春（今浙江富陽）、金陵、豫章（南昌）、南康（今贛州）、臨川、晉安（福建福州）諸郡傳譯經論，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欲泛舶往楞伽修（Lankasuka，今馬來半島北部）國，道俗虔留，遂停南越。後又泛舶至梁安（今福建南安縣豐州），後又從梁安登海舶欲返回本國，途中遭遇風暴，於 562 年飄至廣州，為刺史歐陽頎及廣州道俗挽留，遂停廣州翻經傳法，直到 569 年病逝。	葉凡 240 夾，若華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而所譯只是數甲之文，未譯之梵本並留廣州制止寺（今廣州光孝寺）王園兩寺。		
須菩提 Subhūti，華言善吉	扶南國人	解悟超群，詞彩逸俗，化物無倦，遊歷入華，於揚州至敬寺為陳主譯《大乘寶雲經》。	譯《大乘寶雲經》一部八卷，與梁代曼陀羅所譯之七卷本《寶雲經》少有差異。	557-589 年間入華。	《續高僧傳》卷一〈真諦傳〉；《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藏》冊 55，頁 547 A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大正藏》冊 55，頁 845BC。
那提三藏 梵名布如烏伐邪 Punyopaya，華言福生，訛略云那提	中印度人	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為懷，歷遊諸國，曾往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化達。善解書語，於南海諸國，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中國）東國，轉盛大乘，佛法崇盛，瞻部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唐永徽六年（655）創達京師，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	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所解無相與玄奘師相異。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毘尼外道，四韋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意。然不為時主所重，所寶梵本無由翻譯，僅譯出《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離垢慧菩薩請問經》和《阿吒那智經》共三卷。	655 年抵達京師建業。	《續高僧傳》卷五本傳；《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563A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大正藏》冊 55，頁 863。

		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656 年，敕往昆侖諸國（即南海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廣為弘化。後於 665 年返回中國，擬翻傳所賣入華置慈恩寺之梵本，而此梵本悉為樊師攜往玉華宮，那提意欲翻度，莫有依憑，唯譯《八曼陀羅》等三經。其年南海真臘（今柬埔寨）諸國，那提素所化者，敬奉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云國有好藥，唯提能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遂往南海諸國，後不知所終。			
若那跋陀羅 Jñānabhadra 華言智賢	南海訶陵國（爪哇中部）人	善學三藏，麟德年中（664-665），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訶陵，停住三載，遂共若那跋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涅槃後分二卷。譯畢寄達交州。若那雖未至中國，然其與會寧所譯經典流通中夏，故亦可視為弘法傳教於中華之西僧。	會寧與智賢所譯之《大涅槃經後分》共二卷，乃於《阿笈摩經》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設利羅等事，義淨謂其「斯與《大涅槃》頗不相涉。」此經譯出後，會寧遂令小僧運期奉表賫經，還至交府（今越南河內附近），至儀鳳年初（676），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運期奉表進經，入京。儀鳳三年（678）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啟請施行。	664-665 年間與會寧譯經於訶陵國。	《宋高僧傳》卷二〈智賢傳〉，頁 2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會寧傳〉，頁 76-77；《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大正藏》冊 55，頁 863C。
日照 梵名地婆訶羅： Divākara	中印度人	從印度西北海岸泛海到達廣州，後抵達洛陽，儀鳳四年（679）表請翻度所	先後譯出《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 81 部經典，與佛陀	676 年 左右到達中國。	《宋高僧傳》卷二本傳，頁 32-33；《開元釋教錄》卷九，《

		<p>寶梵本經論，仍准玄奘例，於一大寺別院安置，並大德三五人同譯，先後於兩京東西太原寺翻譯經典。其所譯經論進上，天后親為之作序。深體唐言，善傳佛意。每進新經，回賜豐厚。於武后垂拱四年（688）終於翻經院小房，世壽七十五，葬洛陽龍門。^[註8]</p>	<p>波利合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經論。</p>		<p>大正藏》冊 55，頁 564AB；《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大正藏》冊 55，頁 865AB。</p>
<p>阿彌真那 Mañicinta (或 Ratnacinta) 華言寶思惟</p>	<p>北印度迦濕蜜羅 (Kaśmīra 今克什米爾)</p>	<p>幼而捨家，禪誦為業，進具之後專精律品，慧解超群，學兼真俗，乾文咒術，尤工其妙，加以化導為心，無戀鄉國，泛海東來，遭遇風暴，幾喪性命，後於廣州登陸，於天后長壽二年癸巳（693）抵達洛陽。敕於天宮寺安置，長壽二年至中宗神龍二年（706），於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傳譯經論。神龍二年以後更不譯經，唯精勤禮誦修諸福德，於開元九年（721）入滅，壽百有餘歲。^[註9]</p>	<p>先後譯出《不空（絹）索陀羅尼經》、《浴像功德經》、《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等經典，所譯以密宗經典為主。</p>	<p>693 年 抵達洛陽。</p>	<p>《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567A；《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大正藏》冊 55，頁 867B；《宋高僧傳》卷三〈寶思惟傳〉，頁 42-43。</p>
<p>般刺蜜帝 Pramiti 華言極量</p>	<p>中印度人</p>	<p>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即廣州（《宋高僧傳》原註：印度俗呼廣州為支那，名帝京摩訶支那），乃於廣州制止道場（今廣州光孝寺），神龍元年乙巳（705）五月，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即《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義大夫同中書門下同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p>	<p>譯出《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13 卷，譯出之後，因南使（即南詮之使）入京，經遂流布。</p>	<p>705 年 前後抵達廣州。</p>	<p>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大正藏》冊 55，頁 371C-372A；《宋高僧傳》卷二〈極量傳〉，頁 31；《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大正藏》冊 55，頁 874A。</p>

		寺沙門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			
跋日羅菩提 Vajrabodhi, 此云金剛智	南印度摩 賴耶，應 即《西域 記》卷十 二秣刺耶 (Malaya) 國人也	父婆羅門，幼而出家，遍遊天竺師子國，雖內外博達而偏善總持，於此法門罕有其匹。隨緣遊化，聞大支那佛法崇盛，遂泛舶東遊，經南海二十餘國，於 719 年達於廣州。敕迎就慈恩寺、薦福寺等寺翻經。於是廣弘密教，所住之刹，必建大曼陀羅灌頂道場，不空三藏、僧一行皆行弟子禮焉。732 年 8 月卒於洛陽廣福寺，世壽七十一。	金剛智為密教入華之「開元三大士」之一，所譯主要為密教經典，主要有《七俱胝佛母准泥大明陀羅尼經》一卷、《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四卷、《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	719 年 抵達廣州。	《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冊 55，頁 571BC；《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大正藏》冊 55，頁 875-878；《宋高僧傳》卷一，頁 4-6。
蓮華 Padma	中印度人	以唐德宗興元元年(784)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敕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南天竺金(礎)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毘盧遮那塔所安置，後於貞元十一年(795)奉烏荼國國王使命，賫《華嚴》後分梵夾泛海來華，獻支那天子，敕於崇福寺翻譯。	796 年罽賓沙門般若共大德圓照、智通、道恒、澄觀等將蓮所進之梵本《華嚴後分》四十卷譯為漢文。	784 年 左右抵達 廣州。第 二次於 795 年抵 達京師。	《宋高僧傳》卷三〈蓮華傳〉，頁 47。
般刺若 Prajñā,此云 智慧	北印度迦 畢試衛國 人	姓喬達摩氏，先習小乘，後研大乘，常聞東方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將至廣州，風飄卻返，抵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遍歷南海諸國，780 年載所賫經論，至於廣州。786 年始屆京師。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即慧舅氏之子也，得其引見，敕令與京城諸寺大德翻譯經論，後終於洛陽。	智慧先後與名德圓照、利言、良秀、應真等譯出《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智慧曾參謁五台山，於山中遇山陰僧人智廣，傳授其梵文知識，智廣後編《悉曇字記》一書流傳於世。 ^[註 10]	786 年 抵達廣州。	《宋高僧傳》卷二，頁 22-24。

上表(表一)共計求法、傳教僧俗二百三十六人，其中東來傳教僧尼五十三人，西行求法僧俗一百八十三人。當然，這只是見諸文獻記錄的僧人數目，而記載往往並不等於歷史的

真實，僅就東來西僧而言，其總數可能遠不止此。如《佛祖統紀》卷三十八載：「（北魏宣帝）永平二年（五〇九），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註 11]其中菩提跋陀來自「歌榮國」，此國又作「歌營國」，故地在今印度南端，或謂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按理他應循海路而來。尤可注意者，當時北魏一地竟有西域沙門三千人，此三千人雖非實數，亦可知來華西域沙門之實際數量遠遠超過文獻記載，然而，我們現在研究這段歷史，既要明瞭文獻的局限，又必須尊重文獻記載的價值，以確鑿文獻記載為依據，否則，就可能以想像代替真實，架空立說。

就循海路西行求法活動而言，其起始時間，略晚於陸路，朱士行赴于闐求法在魏甘露五年（二六〇），海路求法僧最早見於文獻記載者為于法蘭、于道邃师徒，其具體時間不可考，約在三六六年之前。晚於朱士行約一個世紀。就東來傳教活動而言，海路亦稍遲於陸路，摩騰、法蘭乃傳說人物，可置而不論。就文獻記載而言，後漢末安世高為最早來華傳教西僧，僧傳謂其「以漢桓（一四七—一六七）之初，始到中夏」[註 12]，約於二世紀中期東來傳法。海路康僧會於二四八年抵達吳都建業，其父輩雖來自康居，然僧會本人則生長於交州，嚴格而論，尚不能算正式的東來西僧。第一個泛海來華傳法之西僧乃支疆梁接，他於孫吳五鳳二年（二五五）抵達廣州，亦略晚於安清約一個世紀。雖然中印間海路航線的開闢與西域之「鑿空」大約同時，但根據目前的信史記載而言，海路之傳教求法活動應晚於陸路。

海路傳教求法活動歷經五個世紀，其間漲落盛衰，變化不居，根據表一的統計，下面將晉初至唐季五百年間，西行求法僧和東來傳教西僧人數以朝代為單位表述如下（表二），以考其縱向變化之軌跡。

朝 代	時 間	西行求法 人 數	東來傳教 人 數	備 註
三國至西晉	220-316 年		4	
東晉	317-420 年	9	6	
南朝宋	420-479 年	3	24	
南朝齊	480-501 年	0	6	
南朝梁	502-556 年	82	4	此 82 人實為梁武帝所遣之 三批使團。曇裕一行往扶南 求舍利；郝騫一行往西天求 佛像；寶雲往扶南迎佛髮。 除此三個使團外，六世紀實 無僧人沿海路從事求法活 動之記載。
南朝陳	557-581 年	0	1	
隋	581-619 年	0	0	
唐	618-907 年	68	8	
不詳		20		此 20 餘人，據《大唐西域 求法高僧傳》載：「可五百 餘歲矣。」義淨 7 世紀赴 印，則此 20 餘人赴印約在 2 世紀，即東漢末年，而當 時中土似無赴印求法者，義 淨所言，可能僅是估計
合計		182	53	西行求法者有姓名可考者 51 人。

從表二人數變化情況來看，非但不同時代之間興衰不定，且東來、西行者之間亦非齊頭並進。

海路西行求法活動，始於四世紀的東晉，以七、八兩個世紀，即唐代為最盛。雖然僅以西行人數而論，似乎南朝梁代為最多，但實際均為梁武帝外派之使節。齊、陳、隋三代竟無一人西行求法，特別是隋代一統天下，兩朝國君都大力扶持佛教，而海路求法活動亦寂然無聞。梁任公在其《中國印度之交通》一文中列有〈西行求法古德表〉，並以世紀為單位，「區年代以校人數，其統計略如下」：

西曆第三世紀（後半）	二人
第四世紀	五人
第五世紀	六十一人
第六世紀	十四人
第七世紀	五十六人
第八世紀（前半）	二十一人。[註 13]

梁表所載，乃海、陸兩路求法運動之整體情況，表中，第六世紀，即梁、陳、隋三個朝代，並未包括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他在表後論曰：最盛為五、七兩個世紀，而六世紀仍「較為衰頹」。原因之一，乃因「六世紀則突厥驟強，交通路梗，請求法者欲往未由」[註 14]。若陸路「交通路梗」則海路應取而代之，成為西行通道之一，僅以西行人數而論，情況似乎如此。六世紀之海路求法人數最多，達八十二人。然事實是此八十二人均為梁武帝派往海外之使臣，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文獻未言其中有出家人，似均為俗人；曇裕、寶雲雖為僧人，然主要為使節身分，並非為求取經典而西行，且只達扶南等地。其人數雖夥，未見有取回任何經典之記載。整個南北朝和隋朝，即五、六兩個世紀，除梁武帝所派之八十二名使臣外，僅有陳初三名求法僧，而此三人之西行實乃東晉求法運動之餘緒。考此三人，智羽、智遠為智嚴之弟子，智嚴乃與法顯同時赴印之求法僧，此二人西行乃智嚴第二次西行之伴侶；而於宋初（四二四）擬由海路西行之道普在此之前亦曾赴印求法，此次未能成行之求法活動乃其第二次西行。故宋朝僅有的三名求法者，實為東晉求法運動之餘波。此後，直到唐代，整個南北朝和隋代實無真正的西行求法僧。隋朝國祚短促，又處在北周武帝滅佛之後不久，佛法初復，百廢待興，僧人尚無暇顧及西行求法，倒在情理之中；而南朝四朝君主都頗崇佛，除了以崇佛出名之梁武帝派有三批使臣之外，並無真正自願西行的求法僧，這一現象的確令人費解，值得深思。

就西行求法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一首一尾兩個高潮期：一是東晉；一是唐代。處於中間之南北朝和隋代，雖不絕如縷，實處於衰落不振之階段。

就東來傳法活動而言，從三國到南北朝，都代有來人，尤其以處五世紀的陳代最為高潮，達二十四人，幾乎佔整個東來西僧總人數的一半，遠遠超過唐代，這其中，包括十九名斯里蘭卡比丘尼。故就東來傳法活動而言，南北朝可謂其興盛期，這與西行求法活動剛好形成對比。西僧雖接踵而來，華僧卻似無同等之熱忱，這時的西行求法活動處於衰落不振時期，而在唐代的求法高潮時期，西來梵僧並不太多，從唐初至貞元末近二百年，僅寥寥八人，遠遠比不上國祚不到五十年的陳。此一現象亦從一個側面說明，到了唐代，印度佛教向中國的傳播形式，已由西僧為主的輸出變成以華僧為主的輸入；對於佛教義理，中國僧眾已由被動的接受變成了主動的引進，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雙向互動的全新的階段。

據梁任公統計，處七、八兩個世紀的唐代，西行者總數為七十七人，而泛海西行者就達六十八人。梁表之搜羅可能有遺漏之處[註 15]，但唐時海路求法者超過陸路則為事實，反映了求法僧對海路政治形勢和地理環境的樂觀估計，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高度繁榮的海上商貿活動。

二、東來西僧與西行華僧之群體比較

從整體構成來看，海路弘法僧群體分為東來傳教之西僧和西行求法之華僧兩大部分；從其運動軌跡來看，此兩大群體相向而行，一個由西向東，力圖傳佛陀教誨於中華，使震旦之國入佛刹土；一個由東向西，意欲求真經聖像於西方，讓「邊地」之民同沾法雨。故其方向相反，宗旨卻同，只不過一個以輸出為己任，一個以引進為宗旨。

雖然目的皆為傳法佈教，但這兩個群體仍有顯著區別：從時間上看，西僧東來早於華僧西行，從某種意義而言，西行求法乃西僧東來傳教之結果；就其行蹤而言，西行求法者大都返回故土，而東來傳教者則多數終老異域；從行動方式來看，西僧東來絕大多數為個人行為，極少兼有使節之職，華僧雖也多為隻影孤征，然亦有不少為集體行動或奉敕西行。

先就時間而論，最早由海路來華傳教之西僧為支疆梁接，約於二五六年抵達交州，文獻記載最早擬由海路赴印求法之華僧為于法蘭、于道邃師徒，時間約為三三六年以前，相去近一個世紀。

就故土觀念而言，中國求法僧較西僧似乎要強烈得多，赴印之中國求法僧絕大多數返回中國，而來華傳法之西僧只有極少數返回故里。當然，這與各自的目標不同有關，華僧西行旨在從西天求回佛典，故只有返回中國才能達其目的；西僧東來意欲弘傳佛法，其留華時間愈長，其傳法佈道之成果愈豐。不過，去留之間仍然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其不同的故土觀念。

據梁任公統計，海陸兩路西行求法僧留而不歸者共有七人，即「朱士行（留于闐）、道整、道希、慧業、玄恪、智行、大乘燈（並留印度）」[註 16]。考此七人，真正留而不歸者僅

朱士行和道整，其餘五人均病故於印度，並非如道整般「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註 17]，而是因病逝世不能歸國。道希「遭疾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對其客死異鄉之厄，義淨嘆曰：「如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註 18]新羅僧玄恪也是「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註 19]。智行「至彌伽河北，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註 20]。大乘燈「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滅，於時年餘耳順矣（六十）」。而義淨謂其「每歎曰：『本意弘法，重之東夏，寧志不我遂，奄爾衰年，今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註 21]。謂今生不能返國，來生亦要圓此心願，可見其返國弘法心情之切。慧業為新羅人，卒於那爛陀寺，「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註 22]。其所寫梵本想亦欲攜回國內翻傳，無奈遇疾而終，不遂所志。

而據筆者對相關文獻資料的考察，就海路求法者而言，真正留而不歸者如表三之四人；除此四人為自願留而不歸者外，其他未能返回中國者，或卒於途中，或莫知所終。

而來華之西僧，文獻明確記載其返回故國者，僅如表四之五人；而這五人中，般刺蜜帝實被迫而返，自願還返者只有四人。此外，明確記載終老中國者，則有表五之十二

表三：海路求法僧住留域外不歸者一覽表

姓名	留歸情況
期運	曾實會寧與訶羅僧若那跋陀羅共譯之《大涅槃經》後分至京師獻上，後返南海室利佛逝，歸俗留住，不復返回中國。
慧琰	泛海至僧訶羅國（斯里蘭卡），遂停彼國，莫辨存亡。
玄遊	高麗人，隨師僧哲泛海至師子國，在此出家，並住留不歸。
懷業	義淨第一次由佛逝返廣州時，與貞固、道宏、法朗等四人隨義淨至室利佛逝，後貞固、道宏隨義淨返廣州時（法朗病逝於訶陵國），留住佛逝，不返番禺。

表四：來華傳教返回本土西僧一覽表

姓名	國屬	留歸情況
耆域	天竺人	由海路入華，多行神異，後渡流沙，辭還天竺，不知所終。
曇摩耶舍	罽賓人	以晉隆安中泛海至廣州，並北上長安譯經傳法，至宋元嘉（424-453）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僧伽跋摩	天竺人	宋元嘉間由陸路至長安，傳譯經典，後隨賈人舶還外國，莫詳所終。
般刺蜜帝	中印度人	實梵本《楞嚴經》泛海至廣州，並與房融、懷迪等譯出此經。會其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
未知名三藏法師	西域人（應為印度人）	實《善見律毗婆沙》梵本泛海至廣州，臨登岸，將律藏附弟子僧伽跋陀羅，引舶還去。

表五：圓寂於中國之傳教西僧一覽表

姓名	國屬	留歸情況
康僧會	康居人	248 年抵吳都建業，弘法 32 年，於 280 年終於建業（南京）。
佛陀跋陀羅	印度人	元嘉六年（429）卒於建康，春秋七十有一。
求那跋摩	罽賓人	圓寂於建康祇洹寺，春秋六十有五。
求那跋地	中印度人	於 468 年卒於建康，春秋七十有五。
僧伽婆羅	扶南國人	以 506 年奉敕翻經於占雲館，524 年終於該寺，世壽六十五。
真諦	西印度優禪尼國人	四大譯經師之一，569 年終於廣州，世壽七十。
菩提達磨	南天竺人	終於少林寺，弟子葬之於熊耳山，死前自言已一百五十餘歲。
寶思惟	北印度迦濕蜜羅（克什米爾）人	開元九年（721）年入滅，壽百有餘歲。
金剛智	南印度摩賴耶國人	732 年卒於洛陽廣福寺，世壽七十一。
般刺若	北印度迦畢試衛國人	終於洛陽，葬龍門之西崗。
日照（地婆訶羅）	中印度人	於 688 年終於翻經院，世壽七十五，葬洛陽龍門。

人。

從表四、表五的統計可見，圓寂於中國的人數遠遠超過返回故土者，而且，卒於中國者世壽多在六十、七十以上，不屬猝然病故，無法返國，實為壽終正寢，終其天年。可見其多有畢生弘法異域之志，而少返回故土之念，不像西行華僧那樣，有著難以割捨的故土觀念。

中國求法僧雖亦斷絕凡情，皈依釋氏，弘法為念，浪跡異域，然中華先民狐死首丘，葉落歸根之傳統觀念仍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法顯在師子國佛像邊見到漢地白絹扇，「不覺淒然，淚下滿目」[註 23]；玄奘在天竺時為戒日、鳩摩羅等國王盛情挽留，卻毅然回國；義淨在求法路上鄉愁重重，因「神州故友，索爾分飛」，「此時躑躅，難以為懷」，賦詩嘆道「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註 24]悟空少時隨使團西行，於西國出家，留彼四十餘年，至老年時仍「為憶君親」[註 25]，輾轉回國。凡此種種，均說明求法僧大多返回中國，既是傳法弘道之需要，亦是其強烈的故土情緒使然。

從行為方式上看，西僧東來大多屬個體行為，既少兼有使節之命，亦多為隻影孤征。華僧雖大多亦為隻身西行，然也有不少集體行動和銜節奉命者。[註 26]東來僧尼，除鐵薩羅等十九名師子國尼眾分為兩批集體來華外，其他均為單獨一人或師徒二人結伴來華，除蓮華一人於貞元十一年（七九五）第二次來華時，奉烏荼國王之命，賫梵本《華嚴》後分獻與支那天子外，似未見兼有政治使命者。就海路而言，華僧之集體西行者共有四批：

- 一是法顯等十人團。
- 二是道普等十人團。
- 三是法勇等二十五人團。
- 四是由廣州赴印之二十餘支那僧。

而西行求法同時兼有使節之命者則有如下五起：

- 一為沙門曇裕於五三五年奉梁武之命往扶南並南海諸國求取佛舍利。
- 二為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於梁天監元年（五〇二），應詔西行至舍衛國求取佛像。
- 三為沙門寶雲等奉敕於五二九年往扶南迎取佛髮。[註 27]
- 四為不空率弟子含光等二十七人賫國信奉旨往五天竺並師子國。

奉敕西行多為集體行動，故海路求法活動中，實有八次為集體行動。陸路求法活動中亦有四次集體西行乃銜節奉命：

- 一為宋雲、惠生之奉敕西行。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五一八），胡太后敕宋雲、沙門惠生等往西天求經。正光二年（五二一）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註 28]
- 二為韋節、杜行滿等奉敕赴印求經。隋煬帝大業元年（六〇五），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王舍城得佛經。[註 29]

三為悟空初奉敕隨使團西行（七五一—七八九），至罽賓正式出家。

四為玄照第二次西遊時奉敕而行。玄照貞觀年間曾遊西天，後返國，麟德年中（六六四—六六五）奉敕再次西遊，往迦濕彌羅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Lokaditya）。[註 30]

當時海陸兩路之求法活動實有八次乃奉敕西行。此類性質的活動幾乎不見於東來傳教僧人。可見東來、西行兩大群體在起始時間、巡遊方式、故土觀念、整體構成上都有各自的特點和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乃是中、西（域）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在佛教僧侶身上的反映。

三、海路來華西僧國屬構成之特點

海陸兩路均為佛教輸入中國之孔道，然就來往於此二途之西僧之國屬而論，則各具特色。海路以印度或同屬印度語言文化圈之罽賓和斯里蘭卡僧人為主，陸路則以西域或中亞諸國僧人為主。特別是漢魏兩晉時期，這一區別更為明顯。現將海路東來西僧國屬情況列表如表六，以考察來華西僧國屬構成之特點。

表六：晉唐海路東來傳教僧（俗）國屬一覽表

國 屬	人 數	僧 人 名 錄	備 註
天竺 (印度)	18 人	耆域、竺難提、佛陀跋陀羅、法度、求那跋陀羅、竺法眷、僧伽跋摩、求那毗地、曇摩伽陀耶舍、真諦、智藥三藏、菩提達磨、那提三藏、般刺蜜帝、金剛智、般刺若、日照（地婆訶羅）、蓮華。	竺難提為居士，其他為僧人。
康居	1 人	康僧會	
(大)月氏	1 人	支疆梁接	
罽賓	3 人	曇摩耶舍、求那跋摩、阿你那真（寶思惟）。	
師子國	20 人	僧伽跋彌、鐵薩羅等 19 名師子國比丘尼。	
扶南	3 人	僧伽婆羅、曼陀羅（仙）、須菩提。	
南海訶陵國 (爪哇)	1 人	若那跋陀羅	
西域	4 人	支法防、彊梁婁至、僧伽跋陀羅和佚名三藏法師。	支法防從姓氏來判斷應為大月氏人；僧伽跋陀羅與佚名三藏從其法嗣來看應為天竺人。
不詳	2 人	杯度、摩訶乘。	僧傳及經錄言摩訶乘為「外國沙門」。
合計	53 人		

此表共計東來傳教僧尼五十三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三十四人。從總人數來看，斯里蘭卡最多，達二十名，但知其姓名者僅二人；故有姓名可考之傳教僧尼，印度佔多數，共十八名。如果再加上極有可能為印度人的僧伽跋陀羅和佚名三藏法師，則達二十名，佔總人數的三八%；佔有姓名可考之梵僧人數之五九%。如將同屬印度語言文化圈之罽賓和斯里蘭卡視為一體，則達四十三人，佔海路傳教僧總數的八一%。可見海路傳教僧以來自印度本土、斯里蘭卡和罽賓的僧人為主，中亞或西域諸國僧人僅有六人。陸路東來西僧，特別是早期來華者，多以中亞人為主，為節省篇幅，本文不擬將陸路東來西僧情況全部列表，現僅將二至三世紀由陸路來華西僧之國屬列表如表七，以考見其國屬構成之一斑。

表七：二至三世紀陸路東來西僧國屬一覽表[註 31]

僧名	國籍	入華年代
安世高	安息人	148 年入華。
竺大力	印度人	197 年與康孟詳合譯經典。
竺佛朔	印度人	179 年抵達洛陽。
安玄	安息人	190 年至洛陽。
支婁迦讖	月支人	167 年至洛陽。
支曜	月支人	168 至 220 年間至洛陽。
康巨	西域人	168-220 年間入華。
康孟詳	西域人	194-199 年間入華。
曇果	西域人	207 年譯經於洛陽。
曇摩迦羅	中印度人	於 222 年抵達許昌。
康僧鎧	康居人	252 年抵達洛陽。
曇諦	安息人	254 年至洛陽。
白延	西域人 (應為龜茲人)	258 年遊化洛陽。
安法賢	安息人	256 年譯經洛陽。
支謙	月支居士	220 年入華。
維祇難	印度人	224 年至武昌譯經。
竺律炎	中印度人	224 年與維祇難同至武昌。
竺叔蘭	天竺人	西晉時(265-316)譯經豫章(南昌)。
竺高座	外國沙門	265-290 年間入華傳法。
竺法護 (竺曇摩羅剎)	月支人	265-290 年師事竺高座傳法譯經。
無羅叉	西域人	西晉時共竺叔蘭譯經豫章。
支孝龍	月支人	302 年入華寫經。
安法欽	安息人	281-306 年譯經洛陽。
支法度	月支人	301 年譯經洛陽。

上表為二至三世紀，即漢季至西晉末年見諸文獻記載之來華西僧，共二十四人，其中明確記載為印度者僅四人，可知二至三世紀陸路來華傳教者乃以西域或中亞人為主，直到四世紀情況仍是如此；而海路五百年間明確記載為中亞人者僅有六人，其中僧伽跋陀羅和佚名三藏法師極有可能為印度人，如此，則來自西域者僅為四人。這說明陸路傳教活動主要由西域僧眾承擔，而海路傳法群體則主要由印度、斯里蘭卡和罽賓等國僧尼構成。

這從側面顯示，佛教東被，西域乃一重要中轉站，特別是早期輸入中國之佛教，實為西域化之佛教。海路西僧之東來略晚於陸路，而海路傳教僧主要來自印度、罽賓、斯里蘭卡等國，這與陸路形成明顯區別，這種區別對我們重新認識南海道在佛教傳播中的作用或許不無啓示。

四、西行求法僧之留歸存亡情況

漢唐間之海路求法僧俗，有文獻可考者共一百八十三人中，有姓氏可考者五十三人，佚名者一百三十人。考其國屬，除漢地僧人外，尙有新羅僧三人，高麗僧一人，高昌僧三人，印度僧一人。求法者西行雖多為隻影孤征，亦不乏結隊而行者，結隊而行者知其姓名者少，失其姓氏者眾。集體西行而全部知其姓名者，僅法顯等十一人，其餘七次，有姓名可考者只佔少數。法勇等二十五人，僅法勇、僧猛、曇朗等三人留下姓名；道普等十人除道普本人外，無一留下姓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團，僅此二人留下姓名；不空等二十七人，除不空外，僅含光、慧辯二人留下姓名；義淨所記廣州赴天竺之二十許支那僧人，無一人有姓名可考。

故從整體來看，海路求法者一百八十三人中，有姓名可考者只佔求法群體之少數；就有姓名可考的五十三人而言，客死途中者有之，中途折回者有之，不知所終者有之，居留西方不歸者有之，而取得經論成功返回者又只佔少數。

現將海路西行求法者分為死於途中、不知所終、留而不歸、中途折回、和取經返回等幾大類，表述如表八（見下頁）。

從表八可見，五百年間，從海路抵達天竺取得經像而又成功返回中國者僅寥寥十二人，僅佔海路求法僧總數的六%，佔有姓名可考之求法者總數的二二%。另外，曇裕、寶雲、大津、道宏、貞固雖亦成功返回中國，但均未抵達印度，只是到了扶南、室利佛逝等南海國家。即使加上他們五人，取經返回者也只有十七人，僅佔求法僧總數的九%，佔有姓名可考的求法僧人數的三二%。如此低的成功率，如此高的死亡率，求法旅途之艱險可以想見。對此，義淨感嘆道：

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亡飡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乎！

表八：海路求法僧存亡留歸情況一覽表

結果	人數	姓	名	備 註
死於途中	19 人	于法蘭	終於象林。	其中，4 人終於始發港；9 人終於赴印途中之南海諸國；5 人終於印度；1 人卒於罽賓。
		于道邃	終於交趾。	
		智嚴	第二次赴印時卒於罽賓。	
		道普	於青州登船啟程時傷足而亡。	
		常愍	與其徒弟在航行途中船破身亡。	
		窺冲	卒於王舍城。	
		智岸	卒於南海郎迦戎國。	
		大乘燈	卒於中天竺俱尸城般涅槃寺。	
		彼岸、智岸	卒於室利佛逝。	
		曇閏	卒於訶陵。	
		義輝	卒於郎迦戎國。	
		無行	終於北印度。	
		法振	終於南海羯荼。	
		乘悟	終於南海瞻波國。	
		解脫天	卒於印度大覺寺。	
		智行	至西天竺信者寺而卒。	
玄達	因病卒於廣州。			
法朗	亡於訶陵。			
不知所終	10 人	智羽、智遠	奉智嚴為師至印度，嚴卒後歸報，後俱還外國，不知所終。	7 人至印度後不知所終；2 人至師子國後不知所終；1 人至南海訶陵國後失蹤於航行途中。
		明遠	至中印度大覺寺後不知所終。	
		義朗、義玄兄弟	到師子洲後不知所終（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謂其「多是魂歸異代矣」）。	
		會寧	從訶陵泛海至西方後不知所終。	
		道琳	至印度後不知所終。	
		曇光	至東印度後不知所終。	
		僧哲	至東印度三摩怛吒國後不知所終。	
居留不歸	4 人	智弘	曾至中印度那爛陀寺，後不知所終。	2 人留室利佛逝；2 人留斯里蘭卡。
		玄遊	隨其師僧哲至師子國，遂在此出家定居。	
		運期	於室利佛逝還俗定居。	
		慧琰	泛海至僧訶羅國（斯里蘭卡），遂停彼國，莫辨存亡。	
中途折回	3 人	懷業	至室利佛逝，留而不返。	
		慧命	至占波，屢遭風暴，廢然而返。	
		善行	隨義淨至室利佛逝，櫻疾而返。	
成功返回	17 人	乘如	與法振、乘悟泛海至羯荼國，法振、乘悟先後病逝，遂返回故里。	其中 12 人抵達印度後成功返回；5 人抵達南海諸國後返回。
		抵達印度求取經像而成功返回者	法顯、靈運、法勇、郝騫、謝文華、義淨、道宏、慧日、不空、含光、慧辯和慧超。	
		僅抵達南海諸國而返回者	曇裕、寶雲、大津、道宏、貞固。	
合計	53 人			

由表八統計數字來看，義淨所描述求法生活之艱難困苦，求法旅途之危險重重，求法歸來者之九死一生，誠非虛語。印度佛典流傳中國的背後，乃是無數求法者的艱辛困苦乃至生命付出。

五、西行求法者之籍貫

漢唐五百年間，循海路赴印求法者，以籍貫而論，分布雖廣，然極不平衡，下面將海路求法者之籍貫（國屬）列表如表九。

表九中所列求法者之籍貫，確切可考者四十七人，不詳者達一百三十六人。然考此一百三十六人，不空等二十七人，兼有使節身分；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團隊和寶雲均為梁武帝之使節，且寶雲僅至扶南等南海諸國而回，故除此一百餘名銜節奉命之使臣外，真正自願赴印之求法僧，其籍貫不詳者人數並不算多。

表九：海路西行求法僧籍貫一覽表

省份或國屬	人數	僧人名錄	備註
河北	2	于法蘭、義淨。	義淨祖籍河北涿縣，生於山東濟南。
甘肅	2	于道邃、智嚴。	
山西	4	法顯、常愍及弟子一人、善行。	
遼寧	1	法勇	
新疆	3	道普、彼岸、智岸。	此三僧皆高昌（今新疆哈密）人。
江蘇	2	曇裕、玄達。	此二人之籍貫均為今江蘇南京市。
四川	5	明遠、義朗、智岸、義玄、會寧。	
交州（愛州）	6	窺沖、運期、解脫天、智行、慧琰、大乘燈。	
河南	5	曇閏、義輝、智弘、貞固、道宏。	
湖北	8	道琳、曇光、慧命、靈運、無行、法振、乘悟、法朗。	
湖南	2	僧哲、大津。	
陝西	1	乘如	
山東	1	慧日	
印度	1	不空	
朝鮮半島	4	新羅二僧、玄遊、慧超。	玄遊為高麗人，慧超為新羅人。
不詳	136	智羽、智遠與法勇同行並最後由海道返回之 5 人；懷業、含光、慧辯等隨不空赴印之 27 人；義淨所記之支那寺 20 許中國僧人；郝騫、謝文華等 80 人和赴扶南迎取佛髮之寶雲。	懷業「祖父本是北人」，生於廣府。
合計	183		其中有籍貫、國屬可考者 47 人，籍貫、國屬不詳者 136 人。

就有籍貫可考之求法僧而言，其地域分布，以湖北為最多，共八人；交州（今廣西和越南北部）次之，為六人；再次四川和河南，分別為五人；其他山西、朝鮮半島分別為四人。

主要集中於長江和黃河中遊地區，即湖北、四川、河南、湖南等省，達二十人，約佔有籍貫可考之海路求法僧總數的一半，南方之交州亦為重鎮之一。

荆襄之地，自東吳時維祇難、竺律炎譯經傳教於武昌之後，佛法漸興，兩晉至唐季遂為佛教流播之要地。荆州之辛寺，乃譯經傳法，高僧駐錫之中心，法顯為赴印求法之開拓者，回國後譯經傳法，最後卒於該寺；[註 32]晉時高僧道安「在樊沔十五載」[註 33]，傳法弘教，四方緇素，聞風而至者不計其數。此後，荆楚之地，高僧輩出，遂發展為與關中、江南勢力相當之佛教重鎮，史跡斑斑，不復贅述。[註 34]荆州地處長江中遊，自兩晉以後即為海舶來往之地，如覺賢（佛馱跋陀羅）曾懸記印度五海舶至華，為關中羅什門下所擯，後至江陵，果見天竺五舶靠港。[註 35]荆楚既為佛法重鎮，又為內河通海之要道，由海道赴印之僧較多，乃在情理之中。

交州自漢武帝時起即為通海夷道之要站，魏晉南北朝時，乃西僧東來、華僧西行之出入港和集散地，漢末士燮統治時即有「夾道焚香」之西來僧俗活動於此，中土闡揚佛法之第一部華人著述《牟子理惑論》亦形成於此，行化東吳之高僧康僧會亦成長於斯，漢唐時期，交州既是海道要衝，又是佛法重鎮，眾緣和合，其地循海求法之士名列第二，亦不出奇。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南，自東漢起即為政治中心之一，白馬馱經之傳說亦與洛陽有關，曹魏時許昌附近之陳留界倉垣水南寺乃譯經重鎮之一，朱士行所求之《放光般若經》即傳譯於此，此後，兩晉至南北朝，洛陽皆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洛陽伽藍記》所記其廟宇香火之盛，就是證明。四川所發現之早期佛教造像甚多，近年來，據中日學者的系統研究，四川乃佛教較早輸入地之一，[註 36]漢唐時亦為佛教興盛之處。豫、蜀兩地循海路赴天竺之求法僧俗，並列第三，亦合乎情理。

然綜觀海路求法僧之籍貫，有兩點特別引人注目：(一)作為中國佛教重鎮同時又是濱海地區的江南僅有二人；(二)作為南海道重要出入港所在地的廣州竟無一人。

作為中國佛教重鎮兼濱海地區的江南僅有二人西行求法，且曇裕之名不見於任何僧傳，僅見於地方文獻，其銜節奉命，泛舶南海，僅至扶南等南海諸國；真正見於僧傳者僅玄達一人，然其僅至廣州，因病而返，並未成行。故江南本籍僧眾，實無真正赴印求法者，這種現象的確頗令人費解。

「江南」和「嶺南」一樣，乃一文化色彩濃於地域色彩之地理名詞，屬約定俗成之指稱，隨著時代的不同有所差異、有所伸縮，大致包括今天的長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區，「基本範圍是浙、贛、閩三省以及蘇南、皖南，淮南的緣江部分也可算在內」[註 37]。這一地區為三國東吳所轄之地，自東晉典午南遷，迄隋統一，數百年間，一直是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亦是佛教最早傳入的地區之一。

漢末來華譯經之安世高，乃有確鑿史實可考之首位西域高僧，江南為其主要弘化之地，嗣後支讖、支謙等相繼傳法於此；東吳時西僧康僧會弘法建業，立壇度僧，譯經建寺，江南佛教初具規模；待晉室東渡，定都建康，歷宋、齊、梁、陳，江南更是成為胡（梵）漢文化交流的濱海之地，成為與關中、洛陽鼎足而三的佛教重鎮，譯場林立，高僧輩出。魏晉至隋初，先後到江南各地譯場傳譯經典的梵僧前後相續、絡繹不絕，著名的有佛馱跋陀羅、帛尸梨蜜多羅、僧伽提婆、僧伽羅叉、佛馱什、曇良耶舍、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僧伽跋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諦等；而求法歸來，於江南開場譯經的有法顯、寶雲、沮渠京聲等，江南譯事不可謂不盛。

弘化江南之大德高僧，對西行求法之事亦曾加措意，東晉時廬山慧遠就曾派弟子法淨、法領遠赴印度，求取梵本；梁武帝亦曾三次派遣使臣至天竺、南海諸國求取佛像、舍利；南朝宋元嘉（四二四—四五三）時，建業道場慧觀為尋求《涅槃》後分，曾啓請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從長廣郡由海道赴印求法。而江南本地之僧人，真正自願西行求法者，海路僅玄達一人（曇裕乃梁武帝派往扶南之使臣），陸路則不見其身影。梁任公在其〈中國印度之交通〉一文中亦注意到此現象，他將漢唐西行求法僧之籍貫列表之後，分析道：

最奇異之現象，則江淮浙人，竟無一也。此一帶為教義最初輸入發育之地，其人富於理解力，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獨於當時之留學運動乃瞠乎其後者，其無乃堅忍之冒險精神不逮北產耶？雖然，當前期（五世紀）運動最盛時，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為北人所專享；後期（七世紀）運動時，政治中心亦在西北，則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便利，不克參加於此運動，亦非甚足怪也。[註 38]

任公上述三點理由，後兩點頗有推敲之餘地。

五世紀「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為北人所專享」；而海路並未為北人所專享，江南為濱海之地，求法者大可循海路西行，然東晉至宋、齊之十二名求法者皆為北人，其中包括地處西域之高昌人道普，求法路線之便利與否並非主因。七世紀（即隋、唐）之政治中心固然在西北，然從求法者籍貫來分析，政治中心區域並非西行最眾之地區，至少海路情況如此，荊州、交州、四川並非政治中心，而西行人數名列前茅。可見求法人數之多寡，與是否為政治中心並無直接關聯。梁文所舉第一點理由，即江南人之「堅忍之冒險精神不逮北產」，則似乎頗中肯綮。

江南本籍僧人不預西行求法之事，似與其民情風俗有關。自漢末三國鼎立迄隋之統一，北方多在戰亂分裂之中，江南政治上相對獨立，社會相對安定；氣候宜人，物產豐富，民眾謀生較易；所謂「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註 39]，其民風文柔，不喜冒險。唐·道宣律師對江南風俗曾評論說：

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為工。[註 40]

對此「俗好浮綺」、「音尚纖婉」之風尚，北齊時之顏之推亦有類似議論：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輕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註 41]

「水土和柔」，蓋指江南生水土、氣候宜人；「辭多鄙俗」，說明江南民眾重視世俗生活，不似北方多慷慨激昂之士，民眾言辭則多市井俚語。可見江南文柔浮綺之民情風俗，自南北朝以來就是如此，可謂由來有自，歷史悠久。

就南北佛門風尚而言，北方四眾，重禪定、講修持，側重宗教實踐。而生活於江南民情風俗中的佛教四眾，則好沈思玄想，理解力強，長於義理分析，故義學大師輩出，異說蜂起，宗派分呈，三論、淨土、天台等中國佛教之主要宗教均發源於此；名士名僧交往密切，形成風氣，僧不廢俗書（如慧遠），士喜論佛理，形成了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強有力的居士護法隊伍。如慧遠蓮社中之雷次宗、劉遺民、周續之、宗炳等皆一時名士；顏延之、謝靈運、周顒、劉勰等皆名士名宦而為護法，對於南朝士大夫篤信佛教並好與名僧交往之史實，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論之甚詳，此不贅述。[註 42]

由教外士大夫和義學僧人組成的江南四眾，不似北方佛教那樣重「外面的莊嚴」，而重「內部的思索」，[註 43]不重儀式，而重理解，不喜冒險求法，熱衷著書立說。故晉唐時期，江南雖為與關中、河洛鼎峙之佛教重鎮，然求法之事不為本籍僧俗所重，赴印西行道上，除並未成行之玄達一人而外，難覓江南四眾之蹤影。

廣州地屬嶺南，在上古時期與江南一樣，同屬越人文化圈。其民情風俗有與江南相似之處。地處嶺海之間，河網縱橫，士民多以商賈為生，其俗喜巫覡、重卜筮，漢唐時代之廣州俗鬼重巫之風濃厚，加之開發較晚，被中原地區視為化外之民，乃貶官流放之所。由於廣州地處嶺海交通要衝，為西來梵僧來華弘法之要站，故佛教之傳入時間亦較早。然而，無論是西僧東來，抑或華僧西行，多以此為驛站或出入港，西僧泛海至廣州，雖也曾在此譯經傳法，但大多以北長安或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為最後目的；華僧西行求法，多在此停留，等待冬季季風揚帆西去。漢唐之間，來往於廣州的中外僧眾雖然不少，然廣州本地之出家人並不多。

自魏晉之際佛教傳入廣州之後，本地民眾中出家為僧、尼者，兩晉時期有官宦女張普明等八十三人，拜東來梵僧曇摩耶舍為師出家為尼，然這些尼眾是否為廣州本土人，不得而知；西晉時有東莞的僧度、苕華出家為僧、尼；[註 44]東晉時有與道安同門的東莞僧法汰，然其主要在北方和江南活動。[註 45]至南北朝時，見諸記載的有東莞尼法緣、法綵，[註 46]南海（郡治為今廣州市）僧慧敬[註 47]和廣州僧法獻[註 48]。

直到唐代六祖惠能黃梅受法之後，創立南禪頓宗，曹溪寶林一躍而成為海內緇素景仰之禪宗祖庭，廣州本地（東吳至唐代，廣州之轄境約相當於今日廣東省之範圍而有所出入）之出家僧眾才有所增多，但這已是唐後期的事了。故漢唐時代，廣州雖可稱「海濱法窟」[註 49]，高僧往來，傳法譯經，成為海內知名譯場之一，但弘法活動的主體多為西來梵僧和北方南下之僧人，本地人出家為僧者並不多見，虔心修道之佛子亦難見於載籍，而以佛事謀生之「市井僧」，不守戒規之「師郎」，倒是多見於唐宋人之筆記遊記。如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之《投荒雜錄》、宋·莊綽之《雞肋編》所記廣州「擁婦食肉」之「師郎」，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記無正式度牒之假冒僧人。對此「在宗教上是荒謬的，在歷史上則是合理的」，「嶺南佛門的化外現象」，蔡鴻生先生在其《清初嶺南佛門事略》一書中曾詳加引證考辨，[註 50]此不贅述。唯宋僧釋志磐所撰《佛祖統紀》，載其在南海親眼所見當地佛僧之情況，世少徵引，現抄錄於下，以推見唐時廣州佛門之一斑：

（北宋雍熙元年，即西元九八四年）詔嶺南粵俗殺人祭鬼、僧置妻孥，所在長吏誠厲，以順正教（原註：《東都事略》）。

述曰：磐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子，皆能執鉦鼓從事於赴請，問其度牒否，則曰：但於本郡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者規微利而不知恩瀆三寶之為過也。今此詔旨，專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心焉。[註 51]

磐文所述，乃北宋時情形，然唐末時房千里就曾寫道：「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為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註 52]又唐末廣州司馬劉恂《嶺表異錄》載：

又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為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並，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註 53]

說明志磐所見之情形，唐時便已存在。這種情況至少透露三點信息：其一，當時廣州佛門有德行具戒牒者少，其二，政府對僧道之管理相當混亂；其三，當時在廣州落髮者，出於信仰者少，出於謀生者多。故漢晉南北朝時，廣州本地人除法汰、法獻、僧度等少數僧人外，較少有見諸僧傳的高僧大德。唐中期南禪興盛之後，廣州才有較多的本地高僧，如高要之石頭希遷、潮州之大顛等，然禪宗強調教外別傳，以心傳心，並不重視經典傳譯，故求法之事不為所重。

晉唐時期，廣州本土僧眾，吃教者眾，信教者寡，其所關心者乃是如何從佛事中謀生營利，至於歷險泛海，冒死求法，顯然非其究心之事。義淨從室利佛逝返回廣州求譯經助手時，隨其泛海至佛逝之貞固、法朗、道宏、懷業等四僧，無一為廣州本地人。故廣州雖為南海商路之始發港，華船蕃舶，艫舳相接，而往返於南海道之求法僧中，不見廣州本地僧眾之身影。

六、西行求法之域外僧人

海路求法僧中，論其國屬，除中國人外，尚有新羅僧三人，高麗僧一人，高昌僧三人，印度僧一人，屬於當時中國版圖之外的共有八人。此八人中，高昌三人，而高昌則仍在今日中國版圖之內，故高昌三僧，仍視為中國籍人。則赴印求法之域外僧眾實有五人，此五人中，不空為唐政府派往斯里蘭卡之使臣。其餘皆為朝鮮半島僧人。值得注意的是，與朝鮮半島一樣，同屬中國漢語系佛教文化圈的日本，隋唐時期向中國派遣過眾多留學僧，竟然沒有一人西行印度求法。

日本佛教源於中國，猶如印度佛教最初是經中亞諸國間接傳入中國一樣，中國佛教最初乃是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傳入日本的，其初傳時間約在五五二年。^[註 54]此後，隋唐時代，特別是唐代，日本向中國派遣了大批「遣唐使」或留學生，「其中一大半是由僧侶充任」^[註 55]。大批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師從中國各宗派祖師研習佛典，將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傳入日本，同時也有大批中國大德託身萬里波濤，赴日傳法，亦有天竺僧人遠至日本傳教。^[註 56]日本僧眾在忙於從中國輸入佛教的同時，也有日本僧眾立志效法中國的求法僧，往佛教的最終源頭印度求法。如八六二年入唐的真如親王，乃日本平城帝之第三子，就曾準備前往印度求法，不幸在途中圓寂，未能如願；^[註 57]北宋時，日僧明慧上人，「元久二年（一二〇五）想從中國到印度去，因病未成」^[註 58]。可知，日本僧眾並非完全不想赴西天求法，然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成行。^[註 59]

佛教傳入朝鮮半島早於日本，約在四世紀後半期，就有中國僧人赴朝鮮半島傳法，前秦時，中國僧人順道等奉旨赴半島北部的高句麗傳法；東晉孝武太元之末（三九六）「白足和尚」曇始「賚經律數十部，往遼東（今朝鮮地區）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麗聞道之始也」。^[註 60]此後，華僧赴半島弘化，半島僧人赴華求法，絡繹不絕，並出現了許多名震一時的義學高僧。至唐代，在從中國輸入佛教經典的同時，半島僧人也步中國僧眾之後塵，

前往印度求法，並留下了許多遊記著述，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就是其中之一。海陸兩路都留下的半島僧人的足跡，現將唐時赴印求法之朝鮮半島僧人表列於表十，以見其規模於一斑。

表十：唐代朝鮮半島西行求法僧一覽表[註 61]

姓名	國屬	行跡	時間	材料出處
阿離耶跋摩	新羅人	以貞觀中出長安往印度求法，巡禮佛跡，住那爛陀寺，抄寫眾經，年七十，死於該寺。	於 627-649 年間發足西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頁 40。
慧業	新羅人	貞觀年間往遊西域。復至天竺，住菩提寺，親禮聖蹤，於那爛陀寺，久而聽讀。年六十餘，終於那爛陀寺。	627-649 年間發足西行。	同上，頁 42。
玄太	新羅人	永徽年間（650-655）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論，旋踵東土，不知所終。	650-655 年間始西行。	同上，頁 43。
玄恪	新羅人	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寺，既伸敬禮，遇疾而亡。	627-649 年間始西行。	同上，頁 44。
佚名二僧	新羅人	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而亡。		同上，頁 45。
慧輪	新羅人	自本國出家，泛舶而至閩越，涉步而屆長安。奉敕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既至西國，遍禮聖蹤，在信者寺，住經十年，後住睹貨羅僧寺，既善梵言，薄閑《俱舍》，年向四十矣。	627-649 年間西行求法。	同上，頁 101。
玄遊	高麗國人	僧哲弟子，隨僧哲泛海西遊，並於師子國出家，留彼不歸。		同上，頁 175。
無漏	新羅王子	肅宗乾元元年（758）因避位附舶入唐，欲遊五天，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之西，至蔥嶺之墟，後因故折回賀蘭山，結茅棲止。遇安史之亂，肅宗訓兵靈武，聞其名，宣徵不起，命郭子儀往諭之，應詔從軍。平亂後，隨駕返京，敕留內寺供養，不久示寂。	約於 768 年左右西行求法。	《宋高僧傳》卷 21，頁 545-546。
無表	三韓人	天寶（743-756）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跡，身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菩薩，寓支提石室，會昌法難時，所藏經藏卷帙未毀，後不知所終。	742-759 年間發足西行。	《宋高僧傳》卷 30，頁 74 頁。
慧超	新羅人	約於唐武后聖曆三年（700）入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密教大師金剛智抵廣州時慧超在此與其相會並受為弟子，約於開元十一年（723）慧超經海路往天竺求法，巡禮聖跡。開元十五年（727）由陸路返回，著有《往五天竺國傳》。733 年在長安從金剛智授密法。於五台山乾元菩提寺作《大乘論伽大教王經·序》，餘不詳。	約於 723 年往印度求法。	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2000 年。
悟真	新羅人	建中二年（781）從長安青龍寺惠果授胎藏及諸尊持念教法，貞元五年經陸路往中印度求法，後終於西藏。	約於 789 年開始西行求法。	《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惠果和尚碑銘》
合計 12 人				

表十共得高麗、新羅求法僧十二人。其中，返回中土者三人，即太玄、無漏和慧超；死於求法途中（包括印度）者六人，即阿離耶跋摩、慧業、玄恪、佚名二僧和悟真；留師子國不歸者一人，即玄遊；不知所終者二人，即太玄和慧輪。他們留下的著述，今天能見到的只有慧超所著之《往五天竺傳》。十二人中有六人死於途中，如再加上不知所終的二人，則八

人消失於異域他鄉，西行求法成功而返者只佔二五%，為法捐軀者則佔七五%。從時間上看，新羅、高麗僧人之西行求法活動基本與唐朝相始終。始於貞觀年間，終於貞元年間，相續近二個世紀，悟真啓程西行之年正是唐代最後一名求法者悟空返回中土的時間，可以說，新羅、高麗求法僧的活動，乃是整個唐代西行求法高潮的組成部分。

七、結語

傳教與求法，乃推動佛教在華傳播的兩種形式，從其相互關係來看，求法實為傳教之結果。「從西域和五印之地來的眾多僧人，在中國弘揚佛法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回報。他們通過自己的弘教活動在中國社會完成了對『西方』的聖化，並使這種聖化了的『西方』深入中國的社會心理之中」[註 62]。西方的聖化，在中國佛門形成了強烈的「邊地」意識，為了將佛教完整、準確地引入中國，一代一代的中國僧俗前仆後繼地奔向他們心中的「中國」——印度去求法傳經，因而，形成了波瀾壯闊的西行求法運動，這是佛教與其他外來宗教在華傳播的明顯區別之一，可以說正是這一區別決定了它們在中國的不同命運和結果。

南海道與陸上絲路一樣，是佛教入華的孔道之一，從總體上看，漢唐時期循此道來華的西僧，以印度本土人而非中亞諸國人為主，與陸路的情況頗異其趣，這對我們重新審視佛教之直接傳播或間接傳播問題或許不無裨益；泛海赴印，其道有三：一為安南道（即交州道）；二為廣州道；三為青州道。按理此三地應為循海路赴印求法者最眾之區域，事實卻並非如此，而是內陸地區僧眾佔多數，沿海地區除交州外反而寥寥，說明隸籍濱海與循海路求法並無必然之聯繫；以時代變化而論，七、八兩個世紀，南海道成為僧人赴印之首選，為海路求法活動最盛之時，這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海上貿易的繁榮，同時也暗示了佛教傳播活動與商貿活動有著內在的互動關係。從整體上看，海路傳教求法活動與陸路有所關聯，但其間並不存在明顯的此消彼長之關係，而是與整個佛教傳播活動的興衰有著明顯的內在聯繫。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蔡鴻生、林悟殊兩位導師的指導、提示，特此致謝！）

【註釋】

[註 1] 此表參考了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年）；梁啓超，〈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為〈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之「西行求法古德表」，載氏著《佛學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一一五—一三三頁。

[註 2] 此取王邦維說，一般認為訶陵在今印尼爪哇島，按義淨的記載，王說較為合理，見義淨著，王邦維校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五十四—五十五頁。

- [註 3] 此處義淨返穗時間取王邦維說，見氏著〈義淨與《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註》，第十七—十九頁。
- [註 4] 見王邦維，〈義淨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代校前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註》，第十三—十四頁。
- [註 5] 悟空並非海路赴印之求法僧，然其西行歸國被視為漢唐西行求法運動結束之標誌，故將其事跡附於表末，以表漢唐西行求法運動之終結。湯用彤謂「此為所知唐代最後之西遊僧人」。見氏著《隋唐佛教史稿》之〈隋唐佛教大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二七八頁。
- [註 6] 陳寅恪先生認為：耆域之名「本印度神醫，詳見《奈女耆域因緣經》、《奈女耆域經》、《四分律》第四十、《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二十一，乃神話之託之中國者。今遽為歷史上真實之人物，謬矣」。此又為一家之說，見氏著《讀書劄記三集》，《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第一三九頁。
- [註 7] 參見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第四十四頁；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卷十一，「鄔闍衍那國」條註一，第九二—九二四頁。
- [註 8] 關於地婆訶羅的行跡參考了 Antonino Forte (富安敦), "Chinese Sources on Divakara"一文，此文為參加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八—二十一日日本紀念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建所七十五周年「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Memorial Symposium fo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論文。文中謂 "Divakara must have left India in late 675 or early 676 and, traveling likely through the sea route, arrived in Luoyang, presumably through Canton, in 676 or early 677, in any case, after that the court had left Louyang for Chang'an on 10 May 676. (pp.5-6)"
- [註 9] 關於寶思惟入華之路線參考了 Antonino Forte (富安敦), "The Activities in China of the Tantric Master Manicintana (Pao-ssu-wei 寶思惟：?—七二一) from Kashmir and of his Northern Indian Collaborators", *East and West*, ISMEO, New Series, Vol.30-Nos 1-4 (Dec.1980), pp.301-308.
- [註 10] 智慧授智廣梵文之事取周一良先生意見，參見氏著〈中國的梵文研究〉，載《周一良集》第三卷〈佛教史與敦煌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二一—二二二頁。
- [註 11]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八〈法運通塞志〉（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二年）第一五四四頁。
- [註 12] 梁·慧皎著，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卷一〈安清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第四頁。
- [註 13] 梁啓超，《佛學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一三四頁。
- [註 14] 同 [註 13]，第一三五頁。
- [註 15] 如梁表未收入梁武帝所遣赴天竺求佛像之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和隋大業元年（六〇五）奉敕赴印求取佛經之韋節、杜行滿等人。韋、杜之西行，參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六頁、第二四一頁。
- [註 16] 同 [註 13]，第一三八頁。

- [註 17] 晉·法顯，《法顯傳》，《大正藏》第五十一冊（史傳部）第八六四頁下。
- [註 18]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第三十六頁。
- [註 19] 同 [註 18]，第四十四頁。
- [註 20] 同 [註 18]，第八十七頁。
- [註 21] 同 [註 18]，第八十八頁。
- [註 22] 同 [註 18]，第四十二頁。
- [註 23] 同 [註 17]，第八六五頁上。
- [註 24] 同 [註 18]，第一五一頁。
- [註 25] 宋·贊寧著，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卷三〈悟空傳〉，第五十頁。
- [註 26] 法國沙畹（E. Chavannes）曾謂：「中國僧人之觀禮運動，不絕於途，……此輩有時寓有外交性質，而為帝國政策之機械。」見氏著《中國之旅行家》，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第二卷第八編，第十一頁。
- [註 27]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七〈法運通塞志〉，第一五一一頁。
- [註 28] 魏·楊衒之著，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八一—二二八頁。另，《佛祖統紀》卷三十八〈法運通塞志〉所記，在時間上略有差異，謂宋雲等於正光二年（五二一）出發，正光四年（五二三）年返回，見第一五四五頁。
- [註 29]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六頁、第二四一頁。
- [註 30] 同 [註 18]，第十一十一頁。
- [註 31] 以上諸人均見慧皎《高僧傳》和僧祐《出三藏記集》。此表參考了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年）第一—十二頁；《周叔迦佛學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第六—四十頁。
- [註 32] 梁·慧皎，《高僧傳》卷三〈法顯傳〉，第八十七—九十頁。
- [註 33] 梁·僧祐著，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卷十五〈道安傳〉，第五六二—五六三頁。
- [註 34] 湯用彤謂：「荆襄佛教之盛，蓋亦始於道安。」見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四五頁。
- [註 35] 事見梁《高僧傳》卷二〈佛馱跋陀羅傳〉，第六十九—七十三頁。
- [註 36] 參見阮榮春《佛教傳來的道——南方ルート》（日本：雄渾社株式會社，一九九六年）；吳焯，《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註 37] 嚴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頁。
- [註 38] 同 [註 13]，第一三六頁。

- [註 39] 謝玄暉，〈鼓吹曲〉，梁·蕭統《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卷二十八〈樂府下〉，第二一九頁。
- [註 40] 道宣，《續高僧傳》卷四十〈雜科聲德篇〉之「論」，金陵刻經處（光緒十六年，即西元一八九〇年）刻印本。
- [註 41] 北齊·顏之推著，閻福玲、李世琦、王愛玲註，《顏氏家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卷七〈音辭篇第十八〉，第二八九頁。
- [註 42] 參見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統〉之「世族與佛教」，第三〇二—三一二頁。
- [註 43]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第七章，第一四四頁。
- [註 44] 見慧皎，《高僧傳》卷四〈僧度傳〉，第一七三—一七五頁。
- [註 45] 法汰事見梁《高僧傳》卷五〈法汰傳〉，第一九二—一九三頁。
- [註 46] 梁·寶唱，《比丘尼傳》卷三〈法緣尼傳〉，《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九七〇—九七一頁。
- [註 47] 同 [註 44]，卷十三〈慧敬傳〉，第四八七頁。
- [註 48] 同 [註 44]，卷十三〈法獻傳〉，第四八七—四八八頁。
- [註 49] 見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註 50] 同 [註 49]，第一章〈嶺南——中國佛教的海濱法窟〉，第十一—十五頁。
- [註 51] 同 [註 27]，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第一八四九—一八五〇頁。
- [註 52] 唐·房千里，《投荒雜錄》，載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南中僧〉條。
- [註 53] 唐·劉恂，《嶺表錄異》，載同 [註 52]。
- [註 54] 參見日·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日本佛教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第四—五頁、第十一—十一頁；另《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載：「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五五二—五五五年）初年。」（第一八四四頁）
- [註 55] 日·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日本佛教史綱》，第二十四頁。
- [註 56] 如天竺沙門菩提仙那就到日本傳法，並於聖武天皇天平勝寶四年（七五二）擔任佛像開光供養法會的導師。見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二十八頁。
- [註 57] 同 [註 55]，第四十七頁；第六十七頁。
- [註 58] 同 [註 55]，第一二八—一二九頁。
- [註 59] 書雲，《萬里無雲》載：「一位在西元九世紀到印度求法的日本僧人注意到，在印度許多寺院的壁畫上，玄奘已經被描繪成一個半神的人物。」（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八四頁。則九世紀有日本僧人赴印求法，然該書乃遊記類著作，未註明出處，不知其何所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貝編〉載：「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

多畫玄奘麻屨及匙箸，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之。」（段成式著，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三十八頁）考成式約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左右，約卒於懿宗咸通四年（八六三），居西元九世紀上半葉。《萬里無雲》所本可能就是這段記載，然關於日僧金剛三昧赴印求法之記載，僅見於此，是為孤證，很難據此斷定其乃真實事實。

[註 60] 同 [註 44]，卷十〈曇始傳〉，第三八五頁。

[註 61] 此表參考了黃心川〈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佛教的交流——新羅來華佛教僧侶考〉一文，載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編《隋唐佛教研究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四七—二一三頁。

[註 62] 胡海燕、王建光，〈「西方」與西行求「法」解析〉，《探索與爭鳴》（二〇〇三年）第十二期，第三十七頁。